

昆仑堂

K U N L U N T A N G



王仁辅 云峦飞瀑图 纸本
14×42.5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读孙铨《吴中形胜图》散页
髡残祖堂山居所大火及其后期交游
程桢义生平及其书画鉴藏考略
新见《查士标临米芾信札长卷》小考
《铜官感旧图》旧题及伪作考
蒙叟墨的前尘梦影

昆仑堂美术馆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109号 邮编：215301
电子邮箱：ksklt@ksklt.com 电话：0512-57366892
网址：www.ksklt.com 传真：0512-57366893



孙铨 吴中形胜图之里跨塘图 纸本设色 29.7×37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孙铨 吴中形胜图之昆山图 纸本设色 29.7×37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孙铨 吴中形胜图之外跨塘图 纸本设色 29.7×37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孙铨 吴中形胜图之新洋江图 纸本设色 29.7×37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昆仑堂

二〇二一年
第一期
(总第五十九期)
昆仑堂美术馆主办

封面题字: 朱福元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昇嘉 刘 墨

杨守松 陆家衡

单国霖 姜玉珍

俞建良 夏天星

萧 平 鲁 力

薛永年

主 编: 钱 笠

副 主 编: 沈 江

执行主编: 陆昱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珊珊 沈 江

陆昱华 俞亚琴

钱 笠 顾 工

蒋志坚

编 务: 李晨一 龚永清

地 址: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
109 号

电 话: 0512-57366892

传 真: 0512-57366893

网 址: www.ksklt.com

E-mail : ksklt@ksklt.com

邮 编: 215301

准印证号: JSE-005735

版面设计: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刊图文 未经同意 不得转载

目录

馆藏精品赏析

读孙铨《吴中形胜图》散页…………… 沈 江 2

人物研究

髡残祖堂山居所大火及其后期交游…………… 景 杰 4

程桢义生平及其书画鉴藏考略…………… 李 军 16

书画研究

新见《查士标临米芾信札长卷》小考

——兼谈“西泠八家”蒋仁与平圣台的交往…………… 朱 琪 27

《铜官感旧图》旧题及伪作考…………… 尧育飞 34

蒙叟墨的前尘梦影…………… 陆昱华 44

艺苑零拾

邹之麟斋号“破虏”…………… 文 亮 48

读孙铨《吴中形胜图》散页

□ 沈 江

孙铨（1755—1824），字鉴堂，号少迂，昆山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举人，嘉庆六年（1801）选为南汇县训导（辅助教谕教诲生员）。制府铁保、百龄爱其才，相继列荐。嘉庆十八年（1813）授山东阳信知县，折狱多平恕。二十三年（1818）以失察典史滥刑被罢官。侨寓济南以卒，由其子兆淮扶柩归葬故里，享年七十岁。

孙铨早年从学于吴中名士潘奕隼，受其赏识。中年客居京师有十年之久，被定恭亲王绵恩聘为馆师，教授其孙载铨。成亲王永理亦礼遇之，引为上客。孙铨词章书画皆善，交游如成亲王、翁方纲、法式善、张问陶、徐明理、吴铨等皆一时名流。冯金伯《墨香居画识》中说：孙铨“为成邸所赏识，凡笔墨之事，所需辄应，无不得当。公卿群相推重。与翁覃溪（翁方纲）、法时帆（法式善）两学士，尤称莫逆。”

孙铨工书，秀劲入赵吴兴堂奥。曾收集前贤书翰，刊刻两部《寿石斋藏帖》行世，一辑成亲王书迹，一辑有清七十四家名公翰札，都极有价值。

孙铨善画，山水、兰竹、人物皆能。蒋宝龄《墨林今话》称其：“性好写生，尤喜兰竹。中年兼画山水人物，悉有古韵。”翁方纲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金石考据学家，极推赏孙氏，喜其画，每每染翰相易。孙铨曾为其画《苏斋图》《坡公潍州雪行图》《江山秋思图》，为翁氏友人画《品弈图》。法式善官至侍读学士、

国子监祭酒，与孙铨为好友，孙铨曾为其画《诗龕图》（“诗龕”为法氏斋室）和《移居图》，可惜这些画作除《移居图》外可能均已失传。传世孙铨书画已很少，故存者愈显珍贵。

昆仑堂美术馆藏孙铨《吴中形胜图》散页，共四开，每页横29.7厘米，纵37厘米。此四开山水应是整本册页的遗存，原本至少有八开或十二开，甚至更多。所绘为吴中景致，似都与水道相关。现存四开分别画“里跨塘”“外跨塘”“昆山”和“新洋江”。

娄江是连通苏州、昆山和太仓三地的水道，水流由西向东至太仓浏河口入长江。昆山至太仓段称太仓塘，也为浏河的一段。昆山西门至苏州娄门有72里，北宋至和年间疏浚称至和塘，后称昆山塘，亦为娄江的一段。里跨塘、外跨塘位于昆山塘上游，里跨塘在娄门外，往东为外跨塘，外跨塘往东约12里为唯亭，唯亭东为正仪和昆山。清代时唯亭往西为长洲县，往东为昆山县。

一、里跨塘图 此图以横跨娄江单孔石桥为中心，两岸树木成荫，屋宇林立。河中有船三艘，一帆船顺风东行，南岸一艘由两人拉纤上行（向西），另一艘一人摇橹亦东行。图中人物虽小，但刻画颇传神。画左下角题“里跨塘”三字，下钤朱文长方连珠印“孙铨”。

据方志记载，此单孔石桥应为永安桥，俗名里跨塘桥，位于娄门外下塘街北端。南宋庆

元年间始建，明万历九年里人蒋二南重建，清康熙十九年二南曾孙、进士德峻倡助重建。后屡有修缮，2008年底拆毁。曾有桥联“鼓棹东来，蠡泽湖光映远塔；扬帆西去，马鞍山色送舟行。”马鞍山即昆山西北之玉峰山。

今娄门桥下、娄江南岸、莫邪路东侧有“娄门永安桥旧址”，旧址东有新建伽蓝寺，其前身为关帝庙（清顺治年间重建，至“文革”时破败）。此画石桥左侧也有庙宇，与实相符。据此，此图的视角定向应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地图定向相反。

二、外跨塘图 此图亦以石桥为中心。桥南岸为村庄，屋宇众多，大树成荫。桥北堍有一小院，平房两座，篱笆围墙。河中有两船，一船正穿桥洞，船头一人拄篙。桥右，船上三人，一人在船头拄篙，两人正卸帆，准备过桥。桥上两人相对持锣敲打。画幅左下角题“外跨塘”三字，下亦钤“孙铨”小印，形制与上图相同。

据地方志记载，此石桥名永庆桥，一名永丰桥，俗名外跨塘桥，康熙元年圯，十年里人顾奕年重建，咸丰十年毁，桥为石墩架木结构。孙铨所画为单孔石桥，似与方志记载不符，待考。

三、昆山图 昆山亦名马鞍山、玉峰山，在城西北，百里平畴一峰独秀，有真山似假山之美称。此图所绘为从北向南远眺马鞍山景致，其最高处为凌霄塔，塔下为华藏寺，寺门外有亭，为春风亭，皆历历在目。山下城墙环绕，城上有雉楼，应为留晖门（西城门）。城下河流为越河（乾隆年间开浚），南接昆山塘（娄江），绕北城濠而东，汇入新洋江（现青阳港）流向太仓。另一股水流分叉往北，远接常熟七浦塘，现为浏河上游。河中有小岛，上有屋宇，竹树掩映，有舟停泊。此河心岛现仍存在。图右下角题“昆山”二字，下钤“孙铨”小印与他幅相同。

四、新洋江图 新洋江在昆山城东，现称青阳港，南北走向，北起太仓塘（浏河），南接吴淞江，中间有娄江自西向东汇入。笔者据此

图勘察实地，图右下河流应为新洋江，右上为太仓塘，东流太仓，左下方水口，向西接昆山北城濠，其构图视角是在新洋江西岸，自西南向东北眺望。太仓塘是东西向，新洋江与其垂直，所画与实际相符。另外图中白塔也是作此定向的依据。据《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记载，此塔名“玉柱塔，在宾曦门（昆山东城门）外新洋江口”，明万历年间修建，有七级，纯砖石筑成，不涂丹雘，俗称白塔。清同治元年八月被太平军烧毁。白塔在太仓塘北岸。清邑人张潜之有诗“旧俗流传爱踏潮，沿江一塔极岩峣”，邑绅李清凤也有诗“八月十八大潮生，娄江澎湃势纵横。问潮馆阁谁经营？惟有白塔左右争先放棹行”。其时海水可由长江经浏河倒灌逆行而上，至新洋江口形成大潮，每年八月十八官民倾城而出，前往白塔观潮、赛龙舟等，为一时盛事。太仓塘和新洋江水面宽广无法架桥，过河不便，故放棹应在北岸。现“白塔路”“白塔村”“白塔老街”“白塔龙王庙”等，也都在北岸片区。图中白塔沿江，正对新洋江，其右（东侧）有一条小河，河上有桥。此河流现仍存在，其东岸为“白塔路”。孙铨此图为勘定白塔遗址提供了较确切的证据。图中一帆船，正扬帆新洋江中。另有一船，一人在船尾撑篙，两人在岸上拉纤，沿太仓塘向东费力前行。画左下角题“新洋江”三字，下钤“孙铨”小印与他幅相同。

孙铨山水受四王影响，特别是王翬，如上述《移居图》，其款中即说拟仿耕烟散人。对元人倪云林、王蒙也用力颇深。其画承南宗，用笔细腻，惜墨如金，用色明洁淡雅，有韵味。孙铨写生能力很强，此四开册页不仅为我们描绘了200多年前娄江两岸优美的山川景致，也为后人展示了当时真实可信的城池、桥塔、河流等山水风貌，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文献价值。惜只存四页，实弥足珍贵。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副馆长）

髡残祖堂山居所大火及其后期交游

□ 景 杰

髡残(1612-1671)^[1]俗姓刘,湖南常德人。字石溪,一字介丘,号石秃、白秃、石道人、残道人、电住道人等。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画僧之一,髡残与渐江(弘仁)、八大山人、石涛合称“四僧”,与石涛并称“二石”,与青溪程正揆并称“二溪”。自1658年赴杭州皋亭崇先寺皈依觉浪道盛门下后,髡残长期挂锡南京祖堂山幽栖寺直至去世。对其生平行实的研究,祖堂大火一事是一个绕不开的点。笔者在《髡残行实二考》一文里,已考证出祖堂大火实发生于1665年,发生的原因在该文中并未涉及,本文将就大火发生的原因结合明清佛教“房僧”理论进行初步考析。并通过对祖堂大火后髡残创作作品的搜集整理,对髡残晚期的交游活动进行考察,试图还原一个完整、多面貌的画僧髡残。

一、对祖堂大火有关的文献考察

1. 记述祖堂大火的有关文献

目前所见髡残行实资料中明确提及祖堂大火的文献,只有两处。第一处即髡残写给郭都贤的信札,全文如下:

忆与翁十余年前,朝风夕雨,咀苦分甘,最后为吴越行脚。一分手去,又十年矣。掀髯吟哦,握手俯仰,才一瞑目,即

现在前。山河大地,何曾间隔?近传翁为直头陀矣。世间都为俗情限隔,分僧分俗,若能出一头着眼,妻子儿女,法侣也;良友知己,法护也。以法印心,以戒制行,以慈祥接世,观一切好恶境缘,如幻如梦,则容膝之所,衽席之间,一大佛国也,舍此他求,则心外生心矣。翁意亦谓然否?石秃数年来借牛头一坐具,今年祖龙一炬,佛书经相,衣具器物,化为灰烬。依旧是昔时一丝也无底人。行年亦近六十,天壤孤独,又加以病苦,可谓至矣。造物善能矢上加尖,若非胸中有个百炼丹头,几化异物去矣。担雪老人之便,匆匆附此,以达近怀。^[2]

信中髡残提到自己的住处遭遇一场大火,佛书经相、衣服用具都化为灰烬。但未提及这场大火的起因为何。从下文看,这一事件对髡残打击甚大。作为早已看空世间万物如梦如幻的得道高僧,写出“天壤孤独,又加以病苦,可谓至矣”这样的话,可见当时凄凉之心境。要不是他多年修行,早已“心如墙壁似”,逆来顺受都无挂碍,只怕早就“化异物去矣”。

第二处是佟世燕修《康熙江宁府志》卷五:

师笔墨高妙,最自矜慎,寺僧求者多不应,以为恨。师初居山巅之太古堂,最称幽胜。寺僧瞰其亡,而火其居。笔砚图

籍无一存者,师晏如也。一宰官购寺之花严楼与居,师自铸辟支佛一尊供楼上,色相奇古,肌骨筋脉,衣纹襞绩,无不具足,世为稀有。师歿而寺僧夺其居,焚其蜕,举其遗像掷之溷中。祖师道场复为酒肉肆馆,真可痛也!^[3]

吕晓女史在《髡残绘画研究》中亦引用此段文字,并认为提供了火灾原因的蛛丝马迹。^[4]从内容看,这段提到了寺僧趁髡残外出时将其居所焚毁的事实,还提到髡残十分矜慎自己的作品,寺僧向他求画很难的情况。所以依上下文逻辑,确不能排除寺僧向髡残求画不得,而纵火发泄不满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大火原因并不在此,而是与部分不守清规戒律的房僧有关,在此段文字末尾亦有“祖师道场复为酒肉肆馆,真可痛也!”待后文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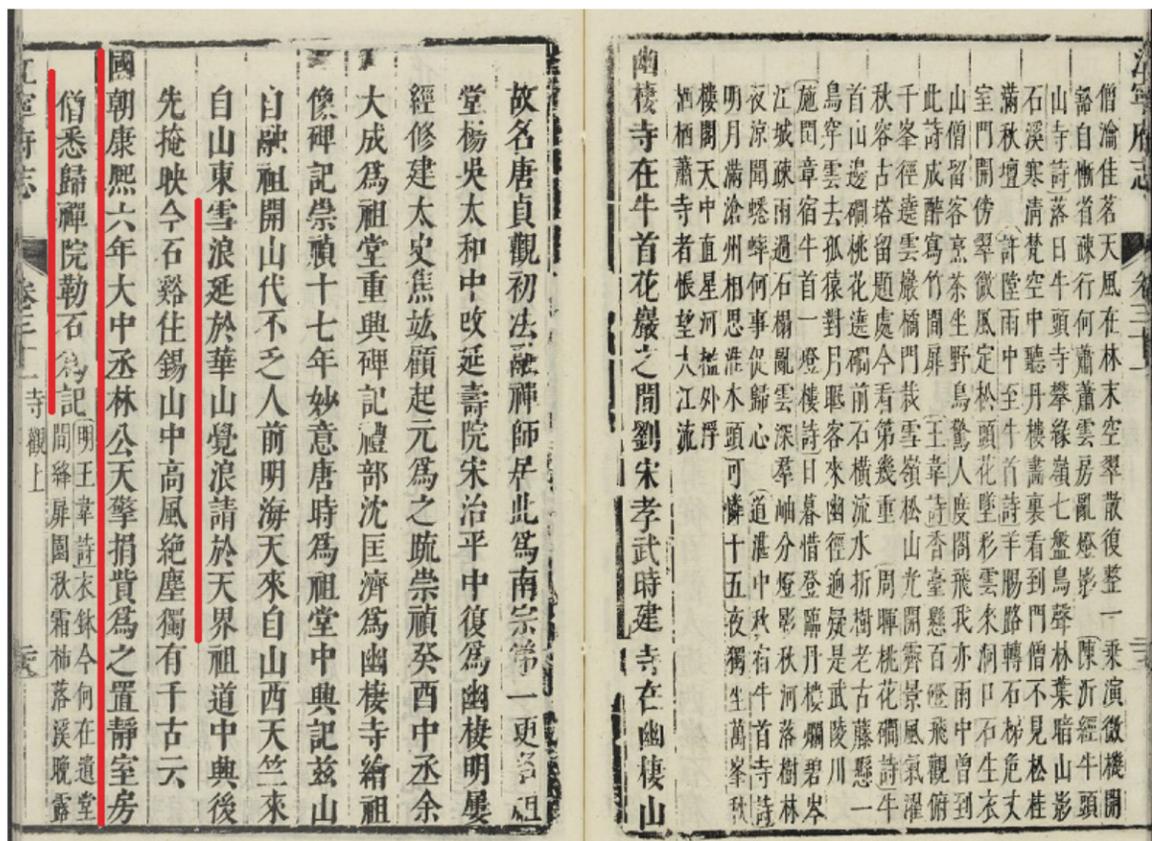
2. 宰官购楼有关文献

文献记载祖堂大火后,有宰官出面为髡残购得幽栖寺内一处居所,目前所见有三处。第一处在上文佟世燕修《康熙江宁府志》,不赘述。第二处在钱澄之《髡残石溪小传》中山足兴斧为髡残所作行状:

师在祖堂,与诸髡不合。有为捐资购大歇堂以居师者,师谢以偈曰:茶蓼生来都吃尽,身心不待死时休。借他两板为棺盖,好事从头一笔勾。^[5]

第三处在陈开虞修《康熙江宁府志》卷三十一·寺观上·幽栖寺条中(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藏康熙七年刻本,以下简称“中科院本”):

今石溪住锡山中。国朝康熙六年,大中丞林公天擎捐资修廡,勒石垂禁,为之



《康熙江宁府志》书影

记。记略云：“祖堂为懒融修证地，岩谷幽靚，林木畏佳，与牛首、花岩并称。三山当日，供献天人，花衔百鸟，灵异之迹，梵芙昭然，凡嗣祖席，咸奉斯堂，故金陵一大选佛场也。旁有废廨一区，厕于经阁斋堂之间。游屐往来，僧徒延纳，多携荤血，荡佚祖规。予惕焉伤之。夜宿呈剑堂中，梦若有人绿袍其颡，招予而言曰：‘吾有弘愿，护此法坛，肃清涤垢，子必勉之。’予梦中唯唯，晓起告知石大师。惠吉逆凶，如响斯答。予受神命，敢不肃将。爰捐百金，修葺廨宇，以供耆德。易其堂曰大歇。非独使赤髯白足之侶望岫息心，亦欲令素衣黔首之徒，闻风归善。自今伊始，来游兹山者，其加护持，无携荤酒。廿一日之淡泊，亦利身心。护三宝之清规，尤资慧命。凡在僧徒，弥当恪守。爰勒贞石，垂示方来云。”^[6]

通过这三处文献相互印证，可知祖堂大火后，有一位名叫林天擎的巡抚为髡残购得幽栖寺内花严楼作为居所，解决了他的住处问题。查阅明万历葛寅亮所著《金陵梵刹志》幽栖山祖堂寺条^[7]，该寺内确有一座名为“华严楼”的五楹建筑。又古代“花”可通“华”，可见《康熙江宁县志》中所书“花严楼”应即“华严楼”。“中科院本”中亦谈到幽栖寺僧在收徒延纳时不守戒律，饮酒食肉的情况。

3. 大火后髡残的临时居所小考

自祖堂大火后，至林天擎购楼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髡残又居于何处？作于1666年丙午，今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秋高气爽图》落款中有：

丙午秋八月上浣，值东田词盟雨中乘兴过余双树轩，袖二楮索画，聊应此。幽栖电住石溪残道人记事。

髡残存世作品绝大多数都记有创作地点和时间，如“借云关”“天阙山房”“大歇堂”等等。

尤其是“大歇堂”，无论是祖堂大火发生的1665年之前，还是林天擎为其购楼并由髡残重新命名为“大歇堂”的1667年之后，都有作品传世。而作品中落款为“双树轩”的仅此一件，且恰好介于1665年祖堂大火，和1667年林天擎购楼之间。故笔者认为，“双树轩”很可能是祖堂大火后髡残的临时住所之一。

二、幽栖寺房僧与髡残的有关问题

同一部地方志，因为前后刻本早晚的差异，内容上会有不同。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康熙七年刻本陈开虞修《康熙江宁府志》（以下简称“哈佛本”）卷三十一·寺观上·幽栖寺条的内容与“中科院本”小异，没有收录林天擎勒石为记的详细内容，但提到了一个词：房僧。

今石溪住锡山中，高风绝尘，独有千古云。国朝康熙六年，大中丞林公天擎捐资为之置静室，房僧悉归禅院，勒石为记。

1. 房僧的概念

“房僧”是明清佛教中常见的概念，与之紧密联系的是明清佛教寺院的“子孙宗法化”现象，宗教学领域对房僧的研究已较深入^[8]。形象地说，明清寺院的“房”与封建宗族内“房”的概念相似，封建宗族出于绵延子嗣等考虑，常有多房子孙的情况；同样，明清时期佛教丛林中也普遍存在着一座寺庙里有一个甚至多个独立分支的情况，一个分支就称为“一房”。各房都有自己的主事人，通常称“房头”，房头所收弟子即称作“房僧”。

世俗社会各房的传承依靠宗族血缘的维系。而明清时期寺院各房的传递靠的是法脉承续。通常房头只剃度，不传戒，剃度的沙弥就是房头自己的势力，形成师徒依附关系。寺庙中最初的房通常是住持或两序僧人退休后自建的庵堂、静室、别院等。当房头年老或圆寂，这一房就像遗产交由剃度弟子接任，子子孙孙一代

代传递下去。如果一个房头有多个继承人，则又会分化出数个新房，新房头通过剃度僧徒又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独立的房。

房头的传递方式具有很强封闭性，与传统十方丛林极不相同。十方丛林一般不剃度，只传戒，寺产为所有常住公有。丛林的住持是从其他寺院迎请或从本寺所有常住僧众中选拔能力出众、德才兼备的僧人担任。房头虽然名义上从属于寺院，但房内财产成为房僧独有的私产，一些势力强大的房头甚至把持寺院住持之位，住持的人选由剃度弟子轮替，成为一座子孙庙。明末清初律宗大师见月读体深感房僧给佛教带来的恶劣影响，在给自己住持的宝华山隆昌律寺所订十条规约中第一条就是：

每见诸方古刹，各房别爨，自立己业，殿堂寂寥，稀僧焚修，致使丛林日渐颓败。过责先主席者，泛滥剃度，不择道品。今某但愿华山永兴，杜绝房头之患。惟与袈裟法亲同居，誓不披剃一人。^[9]

房头现象在明清时期佛教丛林中极为普遍，已是无法规避的问题。且因寺院会不断有高僧退职养老，而不断出现新的房头，渐成尾大不掉之势。随着各房不断扩张，不但会侵占原属于所有常住的公产，还因其传承的封闭性，造成房僧的素质普遍较低，不学禅讲，不守戒律，对寺院的管理构成威胁。

从明代开始佛教日益世俗化，民间对经忏礼拜、水陆法会、放生社、放焰口、结门眷一类的法事活动非常热衷。为此明太祖朱元璋将僧人分三类，即学禅的禅僧，习经的讲僧，和专为民间做各种法事的僧人即瑜伽教僧，又称应付僧或应赴僧。因法事的各种诵经吟唱、显密咒念都有一套规则，需要口、身、意多方配合，故应赴僧绝大部分都是寺院里的房僧以师徒形式代代相传。

明代早期应付僧须经礼部和僧录司考试合格发戒牒才能执业，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日

益突出，军费激增，自然灾害频发，财政捉襟见肘。于是放开“鬻牒”度僧，只要交钱就能出家。因此很多人通过“鬻牒”这种延纳方式进入应付僧群体，他们之所以选择应付僧而不选禅或讲，是因为应付僧直接与世俗社会打交道，能获得很高的报酬。当然，这些应付僧也极易沾染世俗风习，以至于晚明时期的应付僧虽冠以僧名，实已与俗人无异，不坐禅不听讲，惟四处赶经忏作佛事牟利，有些甚至不守戒律饮酒食肉、娶妻生子。不但被有道行的禅讲高僧看不起，民间也多以“俗僧”称之。以髡残的老师觉浪道盛为例，其住持庐山圆通寺时曾对两序执事有如下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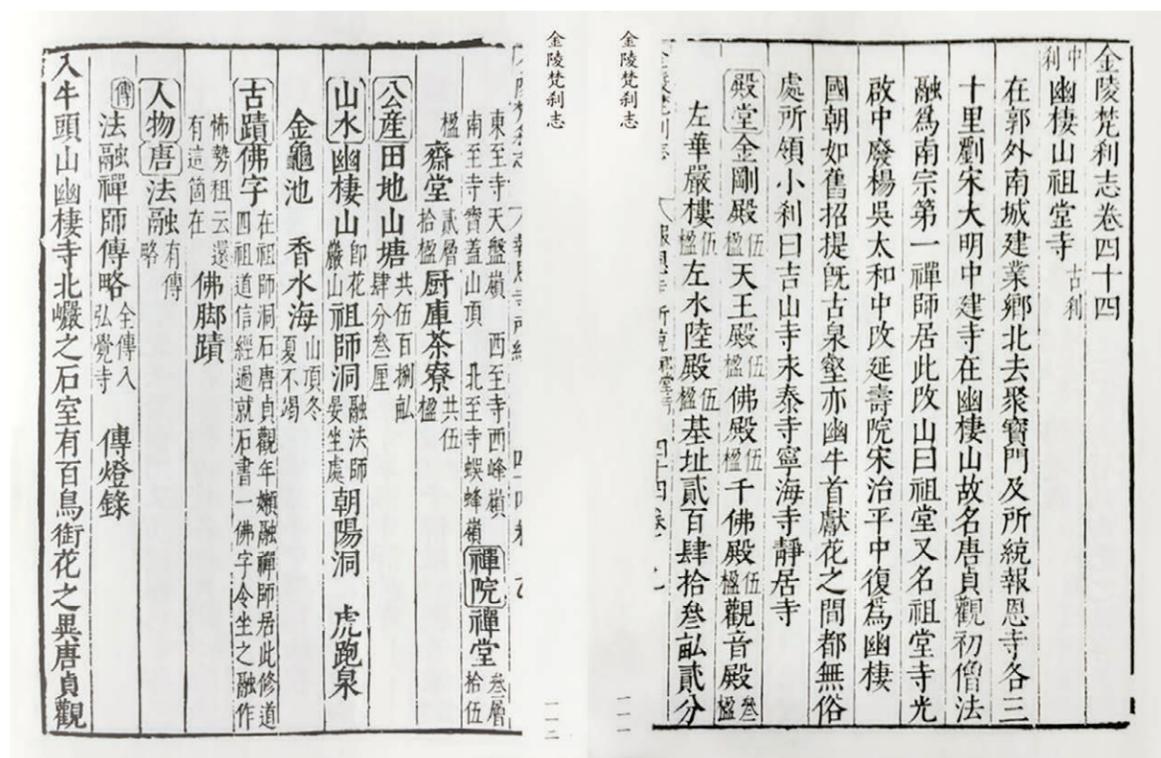
即如我等今住匡山圆通，山中诸刹及诸静室僧众万计。至于本寺四十八房主僧，既彼各来，合众听命，常住职事则当明教而善导之。然此寺宇尚未拓充，其房中僧行，多未惯习礼法，尤宜加意，如父子兄弟骨肉天性处之，而彼薰蒸日久，润泽岁深，亲爱之意渐生，讳忌之念渐化，则此恩惠之至，自然变成法义也。^[10]

诚如名震东南的一代名僧觉浪道盛，对寺中各房亦无可奈何，只能苦口婆心教导东西两序各执事对各房房僧多加教导，待之以仁爱之心，慢慢感化。

2. 幽栖寺内房僧的考察

明万历年间，南京礼部郎中葛寅亮在编纂《金陵梵刹志》时将南京三座大刹（报恩寺、天界寺、灵谷寺）、五座次大刹（鸡鸣寺、静海寺、能仁寺、弘觉寺、栖霞寺）和极少数中刹的寺院架构分为“殿堂”和“禅院/禅堂”两部分，并将寺产的一部分所得分给禅院供众。祖堂幽栖寺是中刹级别寺院中为数不多的拥有“禅院”的寺庙之一。^[11]此举的目的，葛氏在《各寺公费条例》中指出：

禅堂多系行僧，参学持斋，僧规不失。国初瞻僧，原为此辈。奈房僧好丑相形，



《金陵梵刹志》书影

每怀忌嫉。姑念习久难返，止于各该寺租粮十之二三，拨入供众。此皆本司查增，而非夺房僧所有，如敢生事扰害，定从重究治。今禅、讲仅存于禅堂，而房僧绝不知为何物矣。然则圣祖所瞻养之僧，在今日亦惟禅堂足当之也。^[12]

葛氏将僧人分成禅堂里的“行僧”和其他堂口的“房僧”两类，反映出晚明时期南京地区寺院里僧才凋零，禅堂冷清；房僧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真实情况。行僧指四处行脚参学的禅僧和讲僧，大多严守戒律，学习经教，参禅打坐，靠寺院庄田及护法供养施舍维持生存。而葛氏所言“房僧”即前文所说的应付僧。^[13]

从文献上考察，葛氏《金陵梵刹志》幽栖寺条显示寺中有名为“水陆殿”的佛殿，显然是用作水陆法会超度亡灵等法事的道场。晚明四高僧之一满益智旭还记载有名为湛持的住持在寺内藏经阁和斋堂间建大悲坛^[14]，弘扬经忏

教法。可见幽栖寺内确有从事经忏佛事的僧人存在。

又，满益智旭撰《祖堂幽栖寺丁亥除夕普说》文中可考祖堂幽栖寺自晚明至清初的主要住持有：雪浪洪恩、远痕法师、如幻法师、湛持如法师等人：

正德年间，有临济子孙，号海天者，来居此地。嗣有雪浪（雪浪洪恩，笔者注）大师，乃慈恩再来。於时受法者，为瑞麟诸公。而紫柏（达观真可，笔者注）大师亦会杖笠相访。盖自有唐以来，未有盛於斯际者也。雪师寂，高足远痕法主继守从席。远公逝，高足如幻法主又继守之，以授乃弟湛持如公。^[15]

崇祯十七年甲申，曹洞宗禅师觉浪道盛“结制兴善，复主祖堂。”^[16]担任祖堂幽栖寺新一任住持直至去世。道盛入主前数位住持均为雪浪洪恩的徒子徒孙辈，从宗派所属看都为讲、教

一类，与道盛所属禅门不同。雪浪是晚明著名的贤首宗大师，亦通晓天台、慈恩。从满益智旭对雪浪法孙湛持的描述看，他不但潜心净土，对天台、密宗等都有涉猎。道盛与湛持亦有往还，曾作：“牛山早有一枝横，花落花开见几更，拨转上头关捩子，笑他黄檗点龙睛。”^[17]一诗为其祝寿。

笔者认为，“哈佛本”中提到的幽栖寺中“房僧”很有可能即属雪浪一系。首先，雪浪一系僧侣确有在幽栖寺中建立大悲坛等与经忏法事有关的行迹。其次，幽栖寺在道盛入主之前，已在雪浪及其子孙辈手中传承了三代，共四位住持之久，成了名副其实的“子孙庙”。足见实力之雄厚，子孙繁衍之盛，各代住持及两序门下分出房头完全有可能。最后，幽栖寺经雪浪及其弟子辈住持多年后改由曹洞宗道盛入主，对于雪浪一系弟子来说，是自家门庭的旁落，更是寺庙田产、地租、信众供养等世俗经济利益的丢失，其心理落差是可以想见的。此种落差演变成对新入主派系僧侣的敌视与攻击历来不乏先例。

“中科院本”与“哈佛本”《康熙江宁府志》中都明确提到林天擎捐资为髡残购得寺内一处名为花严楼的居所，且勒石为记。“哈佛本”在林天擎为髡残购静室后随即指出“房僧悉归禅院”。“中科院本”虽未提到房僧归禅院一事，但“僧徒延纳多携荤血，荡佚祖规”一句显示幽栖寺里有一群不守清规戒律，在接纳僧徒时沾荤腥的僧人。从两个版本行文逻辑看，“房僧悉归禅院”与“林天擎为髡残捐资置静室”及“勒石为记”这三件事之间有密切联系，纵火烧掉髡残住所的就是这一群房僧无疑。以髡残“性直硬如五石弓”^[18]，“遇弟子一以吓骂从事，非人可堪”^[19]又“戒律极严”^[20]的耿介性格，必然会对房僧不守清规戒律的行径极为不满，导致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房僧报复纵火烧掉了他的居所。事实上，双方的紧张关系早在

道盛尚未圆寂前已初现端倪，道盛的护法居士蔡莲西就曾致信髡残，提到“早已闻山中么魔复有煽邪说以摇动清规之意，必须大家商订，严为惩创。金刚一杵，岂为此辈姑息耶？”^[21]么魔是谁？毫无疑问指的是房僧。大中丞林天擎捐资为髡残购楼的举动，明确表达了对髡残的支持，对房僧起到震慑的作用，并以此为契机将这些原本独立于禅院之外的房僧全部收归于寺，目的显然是加强寺院的统一管理，还幽栖寺一个清净道场。

“房僧悉归禅院”一句还可知，在林天擎将房僧统一收归禅院之前，这些僧人可能居住在禅院之外的其他殿堂里，不受禅院控制。这也符合《金陵梵刹志》中关于幽栖寺产分“殿堂”和“禅院”两部分的描述。

诚然，林天擎动用世俗力量对房僧进行打压和震慑的护法举动确实让髡残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条件，让他的书画创作得以延续。但是这种压制毕竟不是永久的，当髡残圆寂后，房僧果然又卷土重来大肆报复。前文所引佟世燕修《江宁县志》中记述甚详，房僧不但夺走林天擎出资为髡残购得的花严楼（大歇堂），还焚毁髡残的僧衣，将其遗像扔在茅厕里，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县志中虽只云“寺僧”，但毫无疑问仍是那群房僧所为。可见这群房僧的势力很强，竟然敢将林天擎这样巡抚级别宰官的私产据为己有。同时也说明觉浪、髡残等曹洞一派禅僧对幽栖寺的实际控制力很弱，当髡残圆寂后已无人能站出来与这群房僧进行斗争，幽栖寺因此也再次沦为这帮房僧的酒肉肆馆。

三、“祖堂大火”后髡残交游圈的变化

1665年是髡残绘画前后分期的转折点，除了画风出现了转捩，另一个重要却不曾被研究者关注的情况是大量的宰官居士、同道友人成为其作品的收受人或往来题跋的参与者，这一

特点在1665年之前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显示出祖堂大火后髡残交游圈的变化。笔者认为，在与髡残交往过程中，这些宰官居士、道友既扮演了酬唱人的角色，同时也是髡残的供养人或保护人。现将目前所见1665年后带有居士、道友等名款的作品进行了集中整理并制表如下，

限于材料匮乏，本节仅将对这些居士、道友的身份及与髡残的交往进行初步探讨。除却因画存而留名的友人，还有一些宰官护法与髡残的交往目前仅存诗文酬唱，在古籍文献中有所记载，如钱陆灿^[22]、蔡龙文^[23]、施愚山^[24]、方盒山等人，在此亦不赘述。

收受人	作品名称	创作年代	具体时间	材质	形制	尺寸(厘米)	收藏地	目录编号
绳其居士	山水 ^[25]	1665年康熙四年乙巳	初秋	纸本设色	扇页	不详	上海博物馆	
涌幢道契	山水图 ^[26]	同上	冬十月	纸本墨笔	轴	132.4×30.5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津2-079
涌幢道兄 ^[27]	金陵画家	约1665-1666年	不详	绢本设色	册页	18.6×27.2	上海博物馆	沪1-2577
润琴居士	山水	1666年康熙五年丙午	夏	纸本设色	扇页	不详	金陵天渡楼	
绳其居士	山水	同上	长夏日	纸本设色	扇页	不详	金陵天渡楼	
绳其居士	书画卷山水部分	同上	长夏日	纸本设色	卷	28.1×247.3	上海博物馆	沪1-2491
绳其居士	书画卷跋尾部分	同上	中秋	纸本墨笔	卷	同上	上海博物馆	沪1-2491
徐东田	秋高气爽图 ^[28]	同上	秋八月上浣	纸本设色	轴	124.1×60.3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青溪程正揆	四季山水册	同上	深秋	纸本设色	册页	31.2×64.5	分藏于大英博物馆、柏林东亚博物馆等处	
涌幢道契	山斋禅寂图	同上	不详	纸本金笺设色	扇页	18.8×57.5	南京博物院	苏24-0492
涌幢道契	华亭仙掌图	1667年康熙六年丁未	三月	纸本墨笔	轴	73.2×44.9	上海文物商店	沪11-148
牒庐居士	水阁山亭图	同上	四月	纸本设色	轴	100×28.5	安徽省博物馆	皖1-311
式公居士	山水	同上	暮春	纸本墨笔	扇页	不详	四川博物院	川1-217
野翁道长先生	松岩楼阁图	同上	重九前二日	纸本设色	轴	42×30.5	南京博物院	苏24-0493
磴仙居士	山水图	同上	长至	绫本设色	轴	176×53	不详	
山长居士	溪阁读书图	1668年康熙七年戊申	冬十月	纸本设色	扇页	16.6×52	北京故宫博物院	京1-3882
韞生居士	题程青溪山水册页	1670年康熙九年庚戌	春二月	纸本墨笔	册页	26.4×37.9×8	广州美术馆	粤2-186
韞生居士	绿树听鹂图	同上	三月	纸本设色	轴	118.9×32.9	上海博物馆	沪1-2493

续表

收受人	作品名称	创作年代	具体时间	材质	形制	尺寸(厘米)	收藏地	目录编号
尔和居士	山水	同上	春	纸本设色	轴	133×30.5	张大千旧藏	
蹬先汪子	雨花木末图	同上	秋杪	纸本设色	轴	87×47	香港至乐楼	
蹬先居士	山水	同上	梅雨、嘉平等	纸本设色	册页	22.8×15.3×11	上海博物馆	沪1-2494
涓翁大居士	书法	不详	不详	纸本墨笔	扇页	不详	不详	

1. 祖堂大火后与宰官居士的交往

相关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在祖堂大火后助髡残一臂之力的居士首推林天擎。正是林天擎在1667年捐资购得幽栖寺之花岩楼作为髡残的居所，并勒石为记，告诫寺僧及入山大众严守清规，无携荤血。考林天擎：

字玉礎，奉天盖州卫人。顺治二年（1645）以贡生知蒲州，招集流亡，俾村墟炊烟相属。宽城内宣、平二里夫役，无困于供亿。安插满兵，尤有干略，兵民胥颂之。后累官南赣巡抚。^[29]

顺治四年（1647），林天擎曾任江宁知府^[30]，后于顺治十一年（1654）二月升湖广巡抚，十六年（1659）任云南巡抚，十八年（1661）任延绥巡抚，康熙元年（1662）任南赣巡抚，四年（1665）清廷裁南赣巡抚，七年（1668）再任湖广巡抚^[31]。可见林天擎在湖北、陕西、江西、云南等多地担任过巡抚（即大中丞）职务，是清廷早期重要的地方大员，其第四子即“辽东三老”之一的林本裕。通过史料进一步考察可知，林天擎与吴三桂交往密切^[32]，声名狼藉，顺治十六年任云南巡抚时，因贪赃枉法被洪承畴弹劾去官^[33]。髡残能够接受这样一位长期为清廷服务同时还与背叛大明、引

清兵入关的汉奸吴三桂密切交往的宰官的护持与赞助，确实颠覆了以往的认知。要知道，同为宰官的周亮工在通过张瑶星与髡残交往时，髡残曾嘱咐张瑶星：“周栎翁久闻下车矣，不敢以方外人闻问。然此翁具法眼者，自以麋鹿之性，不责于人类，倘或晤问，幸道疏略。”^[34]言语之间颇有避匿之意，而面对林天擎的供养，髡残并未拒绝，而是谢以偈曰：

茶蓼生来都吃尽，身心不待死时休；
借他两板为棺盖，好事从头一笔勾。^[35]

髡残与林天擎的交往记载，除佟世燕修《江宁县志》中所记之外，笔者新发现一处，在1665年为石隐禅师所作《达摩面壁图》^[36]卷后的题跋第五段：

一苇浮空脚踏住，巨渤滔天来南寓。
十年不问是甚么，只见四壁无所顾。回头吸尽西江水，一把翻起石溪悟。莫笑涂鸦自我行，更喜西来共一处。共一处，圆眼自睁得光明，不是怒，见之何必生恐怖。康熙丙午小阳望日。洞侣玉础擎识。”



《达摩面壁图》林天擎跋

张子宁先生认为“未悉玉礎擎为何人，只知同为方外士。”^[97]实际上，玉礎擎不是别人，正是林天擎。这一跋题于1666年，与1667年捐资购楼活动同处于因南赣巡抚被裁撤而候补缺的空闲时期。跋文内容俱是禅语，不赘述。跋尾林天擎未署自己的官职，而是在自己的字号前加上了“洞侣”二字，一则表明自己的身份为皈依曹洞宗的俗家弟子，二则通过“洞侣”暗示自己与髡残同为曹洞法侣的亲近关系。这种委婉的暗示无论是对作品的实际拥有者石隐禅师，还是对作品的创作者髡残来说，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宰官大居士的护法行为。

另一位值得研究的受画人是“绳其居士”。现存受画人为绳其居士的髡残作品有三幅，共四件，分别为两张扇页和一张书画连裱长卷。署款年代最早的一件创作于1665年初秋，正是髡残从苏州灵岩寺返回祖堂之后。笔者已另文考证祖堂大火很有可能发生于髡残赴灵岩继起弘储和尚召之后至从灵岩返回祖堂之前，故绳其居士很可能是髡残在祖堂大火后第一个赠画的人。据笔者考证，绳其居士姓蔡，且其身份与清初临济宗名僧木陈道忞有关，木陈道忞在《布水台集》中有《为绳其蔡居士叔侄易字莘来、渭纶》^[98]一诗。在此诗后，另有《到白门扫东山海舟慈、宝峰瑄（海舟永慈禅师、宝峰明瑄禅师，笔者注）二祖塔》诗，由此可知绳其蔡居士应为南京人无疑。从此人别号“绳其”来看，可能取自成语“绳其祖武”，间接暗示绳其居士祖辈可能为官。而木陈道忞能为绳其居士叔侄二人改字，可见两人的关系应相当密切。道忞作为明末清初遗民僧，因受顺治召见，又加封弘觉禅师名号，遂成为清初禅宗新贵派的代表，处处打压其他遗民僧人势力，在陈垣先生《清初僧诤记》中与道忞有关的僧诤就多达四起。以往学界多认为髡残倾心于遗民僧人一系如继起弘储和觉浪道盛，而对木陈道忞等新贵派敬而远之。然而，这位可能与木陈道忞过

从甚密的绳其居士，却能从1665初秋至1666年中秋短短一年之中四次获得髡残所赠书画，频率之高堪称第一。不禁让人猜想：祖堂大火之后，绳其居士及时出现，利用自己居士身份和人脉关系供养髡残，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慰藉，获得髡残的接纳和青睐。作为一种回馈，髡残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笔墨一再为其作画。

髡残晚年与之往还的居士还有名“蹬先”或“磴仙”者。据笔者考察，目前所见上款人为“蹬先”或“磴仙”的作品有3件，最早一件作于康熙丁未（1667年），剩余两件均作于康熙庚戌（1670年），距髡残圆寂仅一年。其中《雨花木末图》藏于香港至乐楼。按此作笔性风格与苏州博物馆藏1669年作《溪桥策杖图》、上海博物馆藏1670年作《绿树听鹂图》一脉相承，用笔圆浑而细密，用墨湿润，再以较干焦墨勾提皴擦。山石结构堆叠，纵深感弱而块面感强，为髡残晚期风格的典型作品。题款上有“蹬先汪子，读书高座，以雨花木末为海水，为壁响”句，可知蹬先居士姓汪，与髡残交往时尚在雨花台高座寺读书，可能是意在考取功名的儒生^[99]。进一步搜检文献可知，这位汪蹬先（磴仙）即明末清初寓居金陵的皖籍文人、词家汪楦^[40]。

程正揆、周亮工、王岱、孙韞生等宰官居士在前辈学者研究中已论及，不赘述。

2. 祖堂大火后与禅人的交往

除了与宰官居士，祖堂大火后髡残亦与数位禅林道友往来密切。从髡残作品上款人名字分析，居士和道友分得十分清楚，居士一律写居士，如“青溪大居士”“湄翁大居士”“绳其居士”“尔和居士”等，而禅林道友往往用“禅契”“禅友”“道契”“道者”“老道翁”等，以示同道身份。

“涌幢道契”便是祖堂大火后髡残赠画较多的道友之一，其具体身份已不可考，但赠画时间集中在1665年至1667年之间，和林天擎、蔡绳其等宰官居士与髡残展开密切交往几乎同

时。现存最早的赠予涌幢道契的作品作于康熙乙巳年冬，落款中有：“此画作幽栖借云关中，涂抹数日始就。涌幢道契索余画亦数年，意以此偿，其精通当不啻十倍耳。”可见两人早已相识，且赠画的频率很高，据前表笔者的统计，短短两三年时间里亦有四张。髡残为何不在居所未烧、环境安定时赠画，却要在居所被焚，“笔砚图籍无一存者”时赠予？令人遐想。

3. 小结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可以发现在祖堂大火以后，髡残与护法宰官、文人居士、及同道禅友的人际交往变得十分密切，这种密切关系是通过流传至今大量有上款人的书画作品呈现出来的。

对这些存世作品的形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扇页、册页和手卷在其中占了较大比重。这一方面是因为髡残经常生病，已不大可能进行早期那种大尺幅作品的创作。另一方面，折扇和册页这类书画形式，因为画幅较小便于携带和创作，与手卷一样，成为明清以来文人之间应酬交往的重要媒介。因此，笔者认为髡残与这些宰官居士之间的交往带有明显的应酬特点。

除了林天擎用捐资购楼并勒石为记的实际护法行动明确表达对髡残的支持之外，其他的宰官居士和道友与髡残的密切交往，也彰显了双方的亲密关系。不论髡残和宰官居士之间的

交往是单向的主被动关系还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宰官居士所代表的世俗社会力量乃至宦官政治力量通过双方的交往无形之中在髡残周围形成一道保护圈，对幽栖寺其他僧众，尤其是一部分不守清规的房僧起到震慑作用，令他们有所忌惮而不敢轻举妄动。

四、结语

通过以上考述可知，髡残在祖堂大火后确受仕清宰官林天擎的大力帮助，亦有大量士大夫、文人趋前与之往还，为其护持，留下不少作品，可以想见当时热闹之非凡。但是当髡残圆寂后，那些房僧又卷土重来，夺走其居所，并对其遗像、遗物做出大不敬之举动时，曾经趋之若鹜的护法宰官居士们又在哪里？髡残的好友张怡在《登最高峰记》中有一段话颇堪玩味：

还坐东轩，昔昙林上人闭关地也。……壁上粘介丘和尚一诗，读之，增人琴之感。楚公（楚云兴源禅师，竺庵大成法嗣，觉浪道盛法孙。笔者注）因言：“和尚（髡残）在时，诸公鼎礼赞颂，奉为龙象。和尚去，而四大付之江流，一椽化为屠肆，巾钵翰墨之属尽付，不知谁氏之抛却，无复过而问之者，何也？”予曰：“诸公与和尚，原非臭味也。当日奉之有三利焉：和尚道价

高重，门庭峻绝。诸公思以蝇蚋之质，附龙象之尾，依傍古德，骄语时流，一利也；和尚一笔一札，信心信手，皆臻神妙，然绝不轻为人作。诸公谬为恭敬，冀附芝兰，短幅长缣，伺便巧取，二利也；凡奉诸善知识，必费给孤之金，



髡残 草书扇面

设人天之供，而和尚衣坏色衣，食草具食，一介不取，孤标绝尘。诸公有供养之名，无锱铢之费，三利也。今三利亡矣，日中之市，夕而掉臂，此恒情也，何足怪乎？”相与抚掌大笑，复煮酥陀，荐薄持，饱食而起，踏月而归。抵庵，漏下三鼓矣。^[41]

张怡与楚云和尚的这番对话颇有价值，不但使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有关髡残“死后焚骨灰，投弃江流。”^[42]“师在祖堂，尽出生平玩爱之古铜器”^[43]“祖堂道场复为酒肉肆馆，真可痛也”^[44]等描述都得到印证。而且真实地刻画了髡残尚在世时，宰官居士们趋之若鹜，个个争先，而圆寂后概无问津，门庭寂寥的场景，并用一针见血、极富辛辣讽刺意味的文字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在张怡看来，宰官们的所作所为概括起来无非“名利”二字。因为髡残在世间和出世间都享有很高声望，宰官们攀附他以抬高自己的名气。髡残的书画作品“笔墨高妙，而自矜慎”所以宰官们虚情假意地接近他以便伺机获得寸缣片楮，以获其利。髡残“戒律极严”“士大夫以净金供养，必峻却之”，所以士大夫有“供养”之名，无自掏腰包之实，可谓“名利双收”，“一举多得”。此种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在髡残圆寂后，当然是作鸟兽散，无复过问了。

当然，张怡作为与髡残多年交往的友人，这段话无疑是站在维护髡残的立场说的。张怡的友人周亮工也评价髡残：“品行笔墨俱高出人一头地，所与交者，遗逸数辈而已。绘事高明，然不轻为人作。虽奉以兼金，求其一笔，不可得也。至所欲与，即不请，亦以持赠。”^[45]对髡残人品气节评价甚高，对其与仕清官宦的交往不着一笔。而黄宾虹在《石溪石涛画说》中亦有：“性孤僻，寡交际。居寺中，闭关参禅，偃仰寂然者动经岁月。……钱牧斋、周栎园之流颇重之，亦间有唱和，而石溪故不屑伍彼屈节，之所以为之者，殆有所不得已耳。”^[46]之语。虽

承认髡残有与所谓“贰臣”交往的事实，但在宾翁所处的历史背景下，对民族气节的重视无疑让他将髡残与钱谦益、周亮工等人的交往一笔带过，并为其辩解“殆有所不得已”，不得已的具体原因则未说明。

诚非不得已耶？通过前文的论述，相信观者会有自己的评判。笔者无意在此用气节标准去评价髡残晚年与宰官士大夫的密切交往，而是希望通过这些点滴的考证，弥补长期以来相关研究遗留的一些空白与缺憾，为我们展现一个更加真实、全面、完整的髡残。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生）

注释：

[1] 关于髡残卒年，本文认同毛文整《髡残卒年新考及有关补述》一文中的结论，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88-94页。

[2] 周亮工，尺牍新钞二集《藏弃集》卷十一，《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1辑第37种。

[3] 佟世燕修，戴本孝撰《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县志），《康熙江宁县志》卷五，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455-456页。

[4] 吕晓《髡残绘画研究》，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5]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二十一，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424页。

[6] 陈开虞修《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府志），《康熙江宁府志》卷三十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471-472页。

[7] 葛寅亮撰《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专志），《金陵梵刹志》卷四十四，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8] 关于明清佛教子孙宗法化等问题，可参见张雪松《佛教法缘宗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及赖喜德《明清佛教丛林子孙化和宗法化现象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

[9] 释读体《一梦漫言》卷下，福建：莆田广化寺翻印，第57页。

[10] 释道盛，门人大玺、大量、大果、大汕校《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七。

[11] 葛寅亮撰《金陵全书》（甲编·方志类·专志），

《金陵梵刹志》卷四十四，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12] 同上，《金陵梵刹志》卷五十一，第589-591页。

[13] 关于房僧与应付僧可参看欧阳楠《晚明南京地区的寺院等级与寺院经济》、李明阳《明代佛教“分寺清宗”政策变迁与瑜伽教僧地位嬗变研究》及张晖《门徒与门眷：明清江南经忏佛事的商业化经营》等学术文章。这些文章已对明清时期瑜伽教僧、应付僧、房僧及民间经忏佛事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很多成果对本节内容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特别致谢！

[14] 释智旭《祖堂幽栖禅寺大悲坛记》，《灵峰宗论》卷五·记。

[15] 释智旭《祖堂幽栖寺丁亥除夕普说》，《灵峰宗论》卷四·普说。

[16] 陈毅《摄山志》卷三，南京：南京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

[17] 释道盛，门人大成、大奇等编《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卷十。

[18] 程正揆《石溪小传》，《青溪遗稿》卷十九

[19] 钱澄之，《髡残石溪小传》，《田间文集》卷二十一，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423-424页。

[20] 郭都贤《赠石溪师》，《些庵诗钞》卷十·赠云，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77页。

[21] 周亮工《结邻集》卷七，乾隆十九年（1755）刻本。

[22] 见钱陆灿《调运斋诗集》卷八。

[23] 见周亮工《结邻集》卷十一，《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四十二种，民国廿五年六月初版。

[24] 见施闰章《施愚山诗集》卷二十二，《施愚山集·二》，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411页。

[25] 此画未在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著录，见《朵云》第15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

[26] 此画又名《松阳共话图》见《天津博物馆藏绘画》文物出版社。

[27] 此件册页有多位画家龚贤、樊圻、大云、髡残、武丹、萧云从等。萧云从、大云等落款为涌幢道兄、涌幢道厚等，时间最早为乙巳（康熙四年1665），最迟为丙午（康熙五年1666）。

[28] 见《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

[29] 见雍正《山西通志》卷九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 见陈开虞本康熙《江宁府志》卷十六·历官表·中。

[31] 见《清史稿》卷二零一，表四十一，疆臣年表五。

[32] 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康熙七年戊申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33] 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一。

[34] 周亮工，尺牍新钞二集《藏弃集》卷十一，贝叶山房张氏藏版。

[35]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二十一《髡残石溪小传》，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423-424页。

[36] 此图为纸本设色长卷，画芯部分尺寸为21.2×74.8厘米，卷后有多人长题，今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

[37] 张子宁《龚贤与髡残》，见《东南文化》总第八十一期，南京：南京博物院，1990年，第37页。

[38] 释道恣，《布水台集》卷五。

[39] 加拿大学者卜正明认为：大多数士绅在他们作为学生的生涯的若干关键时刻住在寺院，或者因为他们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学习，或者因为他们去省城或京都参加更高级的科考时需要不太昂贵的居所。参见卜正明著、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40] 汪樵，字磴仙，歙人，而居于金陵。与汪沅为兄弟辈，交谊颇深，亦能诗（见汪世清辑注《明清黄山学人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8页）。除了汪沅，汪磴仙还与先著、顾梦游、王石谷、郑簠、梅文鼎、龚贤等人交往密切。先著为明末清初著名词人，住金陵，在其《之溪老人集》中收录与汪磴仙唱和、次答、祝寿的诗词多达八首（见先著《之溪老人集》卷一、三、五，词中、下）。王翬《清晖赠言》中则收录汪磴仙写给王翬的赠诗数首。龚贤与汪磴仙亦相识，龚贤《与王翬书》有“自春初入夏至秋，略得好梦。日来朝闻鹤语，夜拜灯花，不知主何吉兆。顷磴仙使来，手持先生贻赠半亩画幅，展之惊魂动魄，不觉五体投地矣，复何言说，可尽谢忱耶？”（见王翬《清晖阁赠贻尺牍》卷上）。

[41] 陈毅《摄山志》卷五，南京：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17年，第175页。

[42] 钱澄之《田间文集》卷二十一，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424页。

[43] 同上。

[44] 佟世燕修，戴本孝撰《江宁县志》卷五。

[45] 周亮工《读画录》卷二，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46] 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画编·下》，上海书画出版社/浙江省博物馆编，第283页。

程桢义生平及其书画鉴藏考略

□ 李 军

黄山谷《题刘氏所藏展子虔感应观音》诗有云：“人间犹有展生笔，佛事苍茫烟景寒。常恐花飞胡蝶散，明窗一日百回看。”后之好事者，往往以古人成句入印。清代收藏家程桢义即以“明窗一日百回看”一句刊为闲章（图1），钤于所藏书画之上。溯自清代乾嘉以来，苏州收藏家辈出，如潘奕隽（榕皋）三松堂、谢希曾（安山）契兰堂、陆恭（谨庭）松下清斋、蒋元城（春皋）池上书堂、韩崇（履卿）宝铁斋、程桢义（心柏）梅寿堂等，所藏书画既富且精，而中经红羊之乱，为一大转折点，各家藏品泰半流散，顾氏过云楼借机网罗故家遗物，遽而崛起，以收藏甲于江南。潘氏、谢氏有后人分别为编印《三松堂书画记》《契兰堂所见书画》，陆氏有《谨庭老人自订年谱》，韩氏有《履卿书画录》稿本传世，生平、收藏尚可覆按，如蒋、程辈则仅知名而已。曩余发愿，遍考清代吴中藏家声名就湮者，数年前仅成《松下清斋陆氏事迹考》^[1]一稿，后以策划“清代苏州藏家”系列特展，于顾文



图1 “明窗一日百回看”见扬无咎《四梅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彬、吴大澂、潘祖荫、潘奕隽诸家略有考察，然此四家俱著名于世久矣，实毋庸余辞费者。本拟续考蒋春皋、程桢义、王月轩^[2]各家事迹，客岁苏州博物馆举办“清代藏家学术研讨会”，故宫博物院栾林女史有《蒋元城生平及鉴藏事迹考》之作，私幸同行有人，吾道不孤。兹赓续其事，以梅寿堂主人程桢义为对象，勾稽其家世、生平，梳理其藏品，廓清程氏旧藏南宋扬补之《四梅图》递传过程中之误说。

一、程桢义的家世与生平

关于程桢义的生平，晚近以来学者鲜有述及，1940年问世的王季迁、孔达合编《明清画家印鉴》首录其人，1987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沿袭其目，更增益程氏印鉴不少。之后，《杨仁恺谈书法鉴定》所附《历代公私鉴藏印表》^[3]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录文，于其人事迹未加深究。更有甚者，衣若芬《书艺东坡》一书，既以程桢义为“道光间人”，与

缪曰藻并列^[4]，又以程氏为“同治年间人”^[5]，虽从年龄推算，其说未必自相矛盾，但就咸丰中已离世的程桢义而言，却难免贻误后人之讥。

按之清光绪三年（1897）秋程氏资敬义庄续修《程氏支谱》四卷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训义庄续修《程氏支谱》六卷，苏州程氏，源出歙县篁墩程氏，迁皖始祖为东晋程元谭，其中一支于程萑时迁居休宁荪溪，二十三传至程场（1497—？）于明正德、嘉靖间自荪溪迁居苏州府城，是为迁吴始祖。其后传五世至程志敏（1656—1700），生有七子，幼子程翊（1695—1759，字凤歧，号惺斋）即程桢义高祖。苏州程氏一族以经商致富，程桢义曾祖程伯玉系程翊长子，其祖程坤（1754—1815）原名开厚，字载文，号履堂，长洲廩贡生，与兄析产时，据云分得资财数十万之巨。程桢义之父程仁藻（1787—1842），字丽九，号春林，娶潘师澧之女，生有二子：程根义、程桢义。生平详翁心存撰《中议大夫春林公墓志铭》。程根义（1809—1863），字粹初，号晓吾，太学生，无子，过继程桢义子为煜为嗣。

程桢义（1816—1853），字翼初，号心柏（一作星柏）^[6]。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二月十三日，卒于咸丰三年（1853）十月二十八日，年仅三十八岁。苏州府学附生，议叙员外郎，尽先选用，以营建庄祠有功宗族，覃恩加一级、赏戴蓝翎。元配张氏（1816—1848），张守浩之女；侧室金氏（1835—1881）。生子二、女五，长子为煜（1839—1860，字守能，号勉之）出为兄程根义后，次子程曦（1840—1866，字静宜，号孚之）。光绪三年续修《程氏支谱》卷四“传略”（光绪三十一年续修六卷本卷六传略同）有云：

第十一世心柏公。

公仰承遗命，创建义庄于胥门外怀胥里。凡吁请大吏入告及祠制规模、经费俱悉心筹画。始于道光二十四年，至三十年

而成，公综其事，颇尽心力。迨咸丰癸丑，贼陷金陵，从兄楞香公奉命在籍办理团练劝捐，公襄其事，不辞劳瘁，秋以疾歿，显扬未遂，良可惜矣。

此家谱中称程桢义字“心柏”处，盖吴语“心”“星”不相分别。据此可知，程桢义英年早逝，与其协助族兄程庭桂（1796—1868）在乡办团练劝捐，操劳过度有关。程氏为吴门大族，程桢义族兄程卧云（1805—1882，名廷桓）经营钱庄，富甲一方，号称“程百万”。另一族兄程桂（1805—1888，号蟾香）为恒孚银楼创办人，豪于资财，而乐善好施。程桢义被人提及，往往与其创建程氏资敬义庄、续修族谱有关。清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四“资敬义庄”条即云：

在护龙街砂皮巷，旧在胥门外大日晖桥南。国朝道光二十五年，程桢义承其父仁藻遗命创建，其置田二千四百余亩（内吴县田四十九亩一分二厘，长洲县田一千一百八十五亩六厘七毫，元和县田一千二百二十二亩一分二厘五毫）。咸丰十年毁，同治六年重建今所。^[7]

程氏义庄初设于胥门怀胥里，董国华为撰《资敬义庄碑记》。光绪间两修《程氏支谱》前，均冠咸丰元年（1851）秋八月程根义、程桢义兄弟共同署名之序，略云：

根义与吾弟桢义自失怙后，谨承先人未竟之志，偕诸兄宗宋代范、陈遗法，建立义庄于吾郡胥门外怀胥里，非敢谓置恒产、立规条，可以上媲范、陈也。特以先人经画多年，殫心瘁力，庄垂成而遽捐馆舍，至是庶有以慰之耳。

据《支谱》记载，程桢义兄弟共捐长、元两邑官册田一千八百四厘一毫，契价元一万三千二两七钱。咸丰十年义庄被毁后，同治间，程桢义之孙程基裕鸠集族人，重建于砂皮巷。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叶昌炽为撰《重建资敬

义庄碑记》，略云：

程氏系出新安之篁墩，一徙于蒜溪，再徙于苏州。旧有义庄，在胥门外日晖桥。国朝道光中，观察春林公之所经始，而其二子根义、桢义落成之。有贍族田千亩有奇，祭田亦如之。董琴涵太守为之记。越十五年，赭寇陷省垣，庄为墟。今承平二十余年矣，桢义有才子曰基裕，出为根义后，能承二父之……基裕有地一区，在护龙街砂皮巷，当城之中，先人之所遗也。愿体先人之意，建庄于此，众金曰可哉。于是诹吉鳩工，其前为堂，堂东西序为夹室，以次及宗祠、节孝祠、斋宿、阅牲，以逮庖湔，莫不有所。工既葺，程君之族父亘之明经造予门，属为文，饒诸石。^[8]

光绪初年，程卧云又遵父遗命于刘家浜别创成训义庄，故光绪三年、三十一年两次续修《程氏支谱》分别冠以“资敬义庄”“成训义庄”之名，源出于此。

今人章程《苏州程氏》一文中列“宅第·祠堂·藏品”一节^[9]，在祠堂一段略及程桢义，至于谈收藏一段仅述程颢岳（1858—1923，名增瑞，程卧云之孙）次子程钟绅（—1913）妻王季常所保存宋刻《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及明代犀牛角等，于程桢义之收藏只字未提。其实，似从程桢义父辈即有书画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何焯楷书《桃花源诗》轴（图2），一角钤有“程心柏藏”朱文方印、“春林”朱文葫芦印，应为程仁藻、程桢义父子递藏之物。

二、梅寿堂所藏书画及其流散

从现存程桢义旧藏之物来看，何焯的《桃花源诗》轴在其收藏序列中，不过只是冰山一角。程桢义之所以能在二三十岁时，就广加搜藏唐宋以下历代法书名画，缘其家财巨富，能

得人所不能得之物。这让年长他五岁、早年家中并不宽裕的顾文彬（1811—1889）都不无艳羨，在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初二日写给儿子顾承的第六十二号家书中，他就说：

昔年程心柏自己不能赏鉴，以耳为目，专收重价之物，以夸豪富。若过云楼则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气魄更驾乎其上。^[10]

细味其言，顾文彬似抱有当年不能为铭心之品一掷千金之憾。其实，他对于程心柏旧藏确实颇为看重。同年（1873）十月二十二日，顾文彬在第九十三号家书中有谆嘱其子：

巨然卷兼南、北两宗，因忆李友琴所藏夏珪卷虽是北宗，与巨然气息相近，的是真迹。友琴尚有沈石田《关山行旅》、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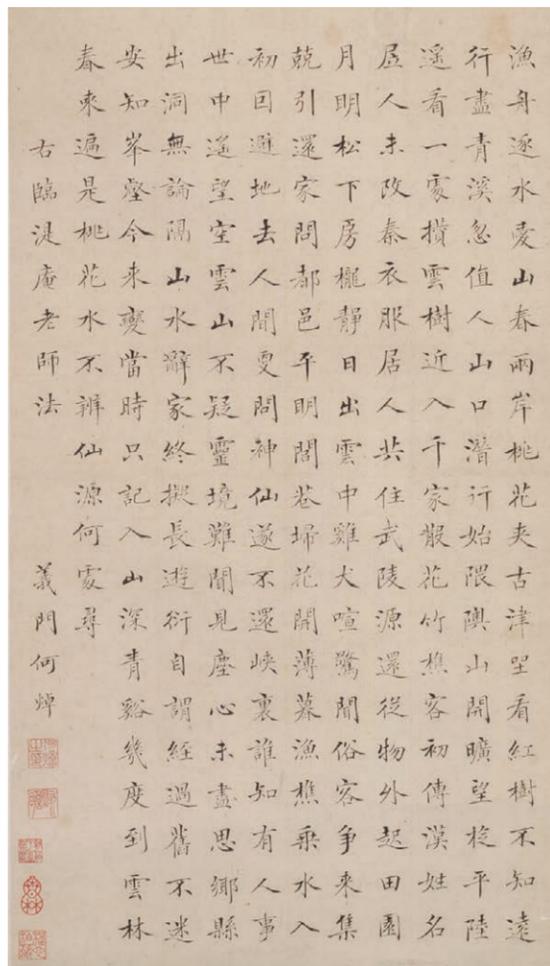


图2 何焯 楷书桃花源记轴 故宫博物院藏

衡山《月湖图》、王孟端《松》，四卷皆是程心柏旧物，我屡促汝去取，汝总因循。友琴光景既窘，且重交情，如其物尚在，知我欲得，必不居奇也。^[11]

按：李友琴名璜，宜兴人，与吴平斋、赵烈文等均有交往，其所藏的程桢义旧蓄四卷，可能得于咸丰庚申之际。所谓“夏珪卷”，岂即《过云楼书画记》卷四著录之“夏禹玉《烟江叠嶂图》卷”耶？顾承阅历不及乃翁，似对此并未足够重视。于是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顾文彬致顾承第二号家书再申前说：

因巨然画，忆及李友琴所藏夏珪卷，亦是此等笔意。当时见之，以为类乎北宗，不以为佳，岂知其摹仿巨然耶。夏珪、马远，人皆以为北宗而轻之，然屈指所见，真迹稀如星凤，苟一遇之，岂可交臂失之！去岁屡嘱汝向李氏物色，汝总因循过去。刻下汝立即过访，倘尚未他售，务将夏珪卷及沈石田《关山行旅》卷、王孟端《松》卷、文衡山《月湖》卷一并携归，或全局得之，或择尤得之。此四卷皆程心柏故物，即齐梅麓二十卷中之四。友琴最重交情，且手头不宽，知我家欲得，必不居奇，然亦不可过于便宜。友琴即无言，恐退老等知之，窃议于旁耳。^[12]

由此可知，程桢义藏品中有一部分源自齐彦槐（1774—1841，号梅麓）、齐学裘（1803—1883）父子宝襖室，除顾文彬言及夏珪、沈周、王绂、文徵明四卷外，后归过云楼的苏东坡《与谢民师书》卷、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等，都是齐氏让予程氏之物。

除齐学裘、顾文彬外，程桢义所交同道之友尚有韩崇（1783—1860）、徐渭仁（1788—1855）、戴熙（1801—1860）等，他们皆与五代董源的《夏山图》有缘。今藏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卷后有一段观款：

道光庚戌八月十一日，海宁杨文荪、

吴县毛庆善、元和程桢义、韩崇同观于七泉仙馆上海徐渭仁之寓庐。^[13]

可见，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程桢义曾与韩崇、毛庆善有海上之行，并过徐渭仁七泉仙馆，观《夏山图》，留“程桢义观”一记于隔水上。此后数年间，程桢义、徐渭仁先后离世，《夏山图》转归松江沈树镛（1832—1873），咸丰九年（1859）戴熙于沈氏宝董室观此图并跋，次年殉难。戴熙《习苦斋画絮》卷四有“大幅为心柏”一条云：

大痴画，云林谓有纵横习气，盖论早年笔；伯雨谓为峰峦浑厚，草木华滋，是论晚年笔也。^[14]

此处戴氏所仿大痴大幅山水，似即为程桢义而作。

程桢义以富家子挟巨资，于道咸间极力搜罗江南旧家累世所保守者，本应著名于世，但因其过早去世，未几苏城又遭庚申之难，程氏人丁凋零，更是雪上加霜。据家谱记载，程仁藻侧室范氏于咸丰十年（1860）七月十五日殉节，年六十二；程根义妻汪氏于咸丰十年（1860）九月十五日殉节，年五十四；出嗣给程根义的程为煜也于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七日殉难，年仅二十二岁，无子，过继程曦独子基裕（1860—1899，字德生，号心余）为后。虽然程基裕于成年后，克承祖风，重振家业，但咸丰十年（1860）他甫出生，适逢战乱，自难保守这些身外之物。程氏梅寿堂所藏之物就陆续流往江北、海上，归于吴云、李翰文、潘遵祁、徐郜、李璜、沈树镛等，其中不少辗转为顾文彬所得。

过云楼旧藏《陶靖节醉休图》，即其中之一。此图款作“元祐六年十二月望日，龙眠山中李公麟画《渊明醉休图》于奏邸竹轩”，后有方明富、邓士龙、潘董言、朱钰、欧阳简、王穉登、瞿中溶、顾文彬等题跋。画芯后隔水钤“程氏秘笈”“桢义鉴藏”“一卷梅花之室”

三朱文方印，瞿中溶跋前钤“程氏心柏审定”朱文方印、“漱石书庄藏印”白文方印；顾文彬跋前钤“程氏慎义审定名迹”朱文方印、“心柏氏”朱文方印、“明窗一日百回看”朱文长方印。顾氏《过云楼书画记》卷五著录：

画后别纸书题《醉休图诗》，不署姓氏。又有方明富、潘董言、邓士龙、朱钰诗词及欧阳简、王穉登跋，今惟青羊君外余子皆不常见，观其笔墨，当亦宋元间人，惜不能如《飞骑习射图》后之叔简、章良能、吴礼部表而出之也。此卷初藏天津安麓村家，后归吾郡程心柏，中间瞿木夫得于陆谨庭犹子果泉，尝三跋其后。木夫名中溶，嘉定人，竹汀先生女夫，所著《官印考证》，颇得钱氏师法，又蓄古泉山，青翠凝结，成岩岫之状，因以名馆。庚申后，为徐颂阁侍郎得之。^[15]

足见此图于咸丰庚申以后为徐郁（1838—1907）所得，后转入过云楼。此卷2010年现身北京保利春拍古代书画专场，不知今归何处。

顾氏过云楼藏品中，尚有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扬补之《四梅图》两卷，系程心柏旧藏。《过云楼书画记》并著于录，而记文皆不及程氏。《潇湘奇观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前有陈眉公题签“米元晖海岳庵图”，后有薛羲、葛元喆、贡师泰、刘中守、邓宇志、吴瓠硕、曾环、朱希文、边猛生、董其昌、李翰文及近人叶恭绰、张大千等题跋。同治元年（1862）

二月李翰文（西园主人）跋云：

予嗜米书，尝以未见墨迹为憾，咸丰己未夏，在吴门得大米三十一字，未未署款，亦无图章，而一种俊逸之气，开卷即知其为南宮真墨无疑。后友人豫粒民太守于翰香馆石刻见此卅一字，携来校对，不爽毫发，由是遂生痴想。尝于齐氏宝襖室搨本见米帖数种，惟小米《海岳庵图》一跋，字势飞舞，笔笔道劲，每一展阅，辄思得墨本一见，足慰生平。庚申岁避居海门，有以元晖《海岳庵图》见售者，先读其画，烟云满纸，气象万千。及观图后一跋，竟与宝襖室所刻无异，末有元明诸名家数跋，并皆精妙。询之知为齐氏旧藏，即石刻之墨本也。两年梦想，如愿相偿，信乎翰墨有良缘也。更喜米氏父子墨迹兼而有之，何其幸哉！

可见，《潇湘奇观图》是李翰文逃难到南通海门期间所得。

与《醉休图》《潇湘奇观图》一样，庚申之乱期间从程氏流出、为顾氏所得者，复有宋苏东坡《与谢民师书》卷、元俞和《临定武兰亭》卷（图3）、清恽南田《瓯香馆写生》册等，分别著录于《过云楼书画记》卷一、卷三、卷十。据顾氏《书画记》载，《与谢民师书》卷“初为缪文子收藏，后归齐梅麓。徐紫珊尝借摹上石，最后为吾吴程心柏所得，乃以售余。近刻《过云楼集帖》，复与《祭黄几道文》并寿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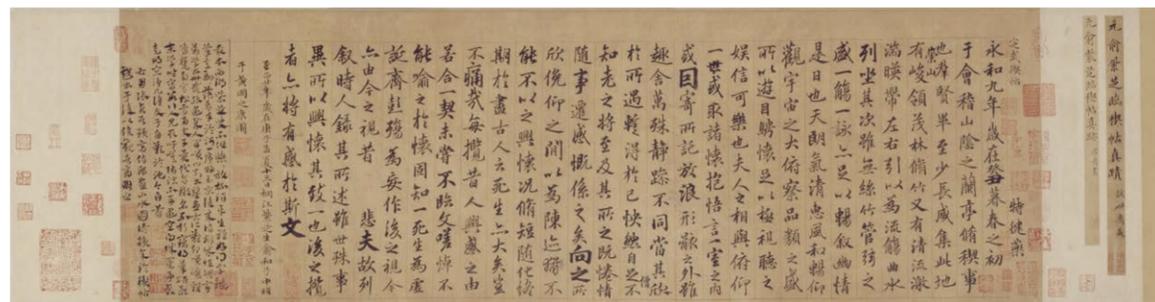


图3 俞和 临定武兰亭卷 故宫博物院藏

世”^[16]，足证程慎义与徐渭仁之交情匪浅。顾文彬“庚申前曾向同郡程君心柏借观”《瓯香馆写生》册，“录其诗墨。乱后购得，而书札已佚，乃发篋补书册尾。今又辗转购得此跋，仍得装入”^[17]。关于俞和《临定武兰亭》卷，《书画记》仅考订“特健药”一词，而未及此卷来源与递藏源流。据吴大澂《辛酉日记》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九日云：

旋至县署候徐子晋，见拓本小品数种，中有长寿钩、愿君毋相忘钩，鱼符二，龟符一，斗检封二，秦铜诏版三，皆诸城刘燕庭方伯所藏至名精品，李锦鸿手拓本。向为吾外祖宝铁斋所集，汇装小册，城陷后姚紫垣于厕溷间得之，出赠子晋者。……去腊，子晋购得俞紫芝《兰亭》真迹，即外祖所搨石刻原本，有程心柏收藏图书，皆南阳当日曾经赏鉴。兵燹之余，尚能一再寓目，客窗展玩，如遇故人。暇日当取各跋一一手录之，汇订一编，以存鸿爪。^[18]

此卷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卷中确有“程慎义珍藏印”“慎义鉴定”“程氏宝玩”“心柏珍秘”及“韩崇曾观”诸印，当即吴大澂于徐康处所见之物。卷后有陈继儒、王澍、顺甫居士、王文治、吴云等题跋。王文治称“是卷旧为吴门缪氏所收，今归休宁试砚斋汪氏”，“由缪入汪，其价值三百金。当时已有石刻，拓本亦佳”，时在嘉庆元年（1796），知经汪毅（1754—1821）试砚斋收藏。据吴大澂称，其外祖父韩崇曾借此卷勒诸石。韩崇与程慎义为挚友，故梅寿堂藏品上时见韩崇印记。

程氏梅寿堂藏品的来源，除齐氏宝襖室、汪氏试砚斋外，还有刘氏寒碧庄、陆氏松下清斋诸家之物。寒碧庄即苏州留园之前身，主人刘恕（1759—1816，号蓉峰）蓄书画碑帖宏富。如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苏东坡《李太白仙诗》卷，

有“刘恕”“寒碧主人”“刘氏寒碧庄印”“传经堂鉴赏”“明窗一日百回看”“心柏珍秘”“慎义秘藏”等印^[19]。上海博物馆藏祝允明《怀知诗》卷，亦有“刘恕”“寒碧主人”“刘恕所好”“蓉峰鉴藏”“心柏珍秘”“慎义”“程心柏藏”等印。另有私人藏唐王维款《辋川图》，有刘氏“传经堂鉴赏”及“慎义之章”“程心柏藏”“沈树镛审定金石文字”等印，2008年至2010年三次现身北京保利拍卖。

陆氏松下清斋之物，以宋扬补之《四梅图》为最著，详见后文。此外，就历年见闻所及，程慎义藏品计有：

故宫博物院藏陈洪绶《草书自书诗》卷（图4），有“程氏心柏审定”“漱石书庄藏印”二印。

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手札》册有“慎义珍赏”“程慎义联珠珍藏印”；陈淳《牡丹图》有“心柏珍秘”“心柏秘玩”“慎义”“程心柏藏”“程漱石鉴赏章”“程氏宝玩”“梅寿堂”等印；王翬《春江捕鱼图》轴有“程氏慎义鉴藏”印，王翬《为烟翁山水》册有“程氏心柏审定”“漱石书庄藏印”。

吉林省博物馆藏《清初六家山水册》九开，赵公緱旧藏，吴湖帆跋，其中王翬《岩岫垂纶》《层峦晓色》两开有“心柏珍秘”印。

昆山昆仑堂美术馆藏王学浩《仿巨然山水》轴，有“慎义秘藏”印。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王时敏、王翬《仿古山水》册（图5），系陆时化、程慎义、李翰文、张之万、孙毓汶、翁同龢、翁万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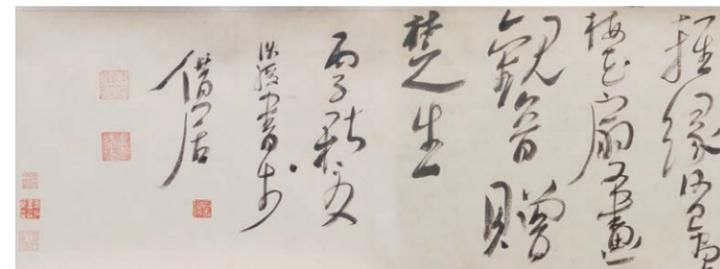


图4 陈洪绶 草书自书诗（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5 王时敏、王翬 仿古山水册(之一)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递藏,有“程桢义”“心柏珍秘”“桢义珍赏”“程氏宝玩”“桢义鉴藏”“吴中程桢义心柏氏秘篋图书”“漱石书庄藏印”“程氏心柏审定”等印。

铃程桢义印记者,公藏以外,尚有流转于私家者,如董其昌《仿巨然山水》卷(2015年北京保利)、董其昌《秋山图》轴(2009年北京瀚海秋拍)、金农《墨梅》轴(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拍)、龚贤《江村渔隐图》轴(2007年浙江西泠印社春拍)、李绶等《杨玉峰衍福乐图》卷(2019年浙江西泠春拍)、华岳《柳溪归舟图》轴(2002年上海国际商品春拍)、康熙《草书古诗十二首》卷(2012年浙江西泠秋拍)、明宣宗《竹雀岚翠图》页(2012年上海驰翰春拍)、杨继盛《草书陆龟蒙诗》轴(2017年北京匡时春拍)、陆师道《松亭高士图》(2010年上海崇源春拍)、



图6 扬补之 四梅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祝允明《桑寄生传》卷(2020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成宗道款《猎骑图》卷(2011年北京保利春拍)、文伯仁《江畔帆影》轴(2017苏州吴门秋拍)、王学浩《青山叠翠图》轴(2003年上海朵云轩秋拍)等,踪迹遍布大江南北,惟其中不免真伪杂糅。甚有伪作苏东坡《寒食帖》(重庆私人藏)、王冕《墨梅图》之类,遍铃历代名家藏记,程桢义亦未能幸免,不禁令人失笑。

三、《四梅图》在梅寿堂时期的几个问题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扬补之《四梅图》卷(图6)上所铃印记,以及元、明、清各代递藏源流,前人多有梳理^[20],兹不复赘。《四梅图》卷在清代苏州地区流传过程中,特别是在程桢义收藏期间,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是素来考察此卷递传关系时尚存疑点的。

首先,《四梅图》卷是程桢义以“番钱三百枚”购入,此说源于卷后道光二十五(1845)秋七月廿一日韩崇(1783—1860)的题跋:

逃禅老人在高宗朝,不直秦桧,屡征不起。画梅作疏枝冷蕊,清瘦绝人,有持入德寿宫者,不合上意,呼为野梅。因自题曰:奉敕村梅。高情逸兴,可与魏野、林逋同传。是卷著录于朱存理《铁网珊瑚》,嘉庆初年,为陆谨庭孝廉所得,特筑四梅

花阁,以度藏之。邀集名流,觞咏其中,为吾吴韵事。曾几何时,流落于外,心柏员外博雅嗜古,一见爱不释手。余为之和会,以番钱三百枚得之。按《洞天清录》云,江西人得补之一幅梅,价不下百千金,当时以贵重若是。画格纸高,不烦赞叹,即以书论,亦清峭峻拔,超妙入神。盖欧书《千文》真迹,在其室中,宜乎深入率更堂奥也。丹邱生步武前贤,词翰双绝,实为此卷后劲。《铁网珊瑚》又载补之竹卷,国朝藏梁蕉林相国秋碧堂中,画尾顾阿瑛题七绝一首,此诗今为寒斋所得。前段墨竹不知何年割裂,流落何所,可见名物之易散,而大美之难全也。心柏获此珍品,宜护如头目,倍加珍袭。古人翰墨有灵,当不胫而至,为漱石轩中集成大观一录也。

从上文所述可知,《四梅图》卷从陆氏松下清斋散出后,归于某家,由韩崇居中介绍,程桢义用银洋三百元购得之。此事从始至终可能都在苏州当地,本无任何疑问。但近年来有人因“番钱”的“番”字产生想当然的误解,提出《四梅图》卷“流落于外邦,被程桢义用番钱三百枚购回”^[21],之后不免谬种流传,以讹传讹,如刘鹤《扬无咎〈四梅图〉研究》一文及“百度百科”^[22]等大众媒体均沿袭其说、广为传播,造成误会不小。在此,有必要重申,《四梅图》卷从苏州的陆恭家散出,经某氏之手,转入程桢义梅寿堂,并未流出国境、去到异国他乡,只是当时交易所使用的是市面上本就流通的外国银币而已。

其次,《四梅图》

卷在流传过程中有双胞胎问题,程桢义当时就已论及,详见下文所引程氏题跋。入藏梅寿堂之后,此卷曾被摹勒上石、传拓流布一时。对此,吴雨苍曾作《四梅花图卷勒石之谜》^[23]一文,将程桢义及其后收藏此卷的潘遵祁、顾文彬等作为对象,考察《四梅图》拓本为何人所刻,最终倾向于程氏,而无铁证。其实,吴雨苍未见《四梅图》墨拓全本,否则这个疑团便会迎刃而解。盖拓本除原卷外,还将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45—1846)间韩崇、程桢义、黄均、潘遵祁等数家题跋一并刻石,读跋文就知刻石者为程桢义,其跋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

思翁云:画家以神品为宗极,而逸品又在神品之上。扬逃禅为南宋一代高人,笔法清淡闲静,诚逸品也。此卷载入吴子敏《大观录》及朱性甫《铁网珊瑚》。余得自己已夏,晨夕展玩,爱逾拱璧,尝考郁逢卿《书画题跋记》,补之画梅四帧、后调《柳梢青》词四阙,在绢素上,有柯丹邱、文衡山等和词。是另一卷,今在金陵。又考《大观录》,徐禹功《梅花三昧图》后有补之书《柳梢青》十首,可见古人得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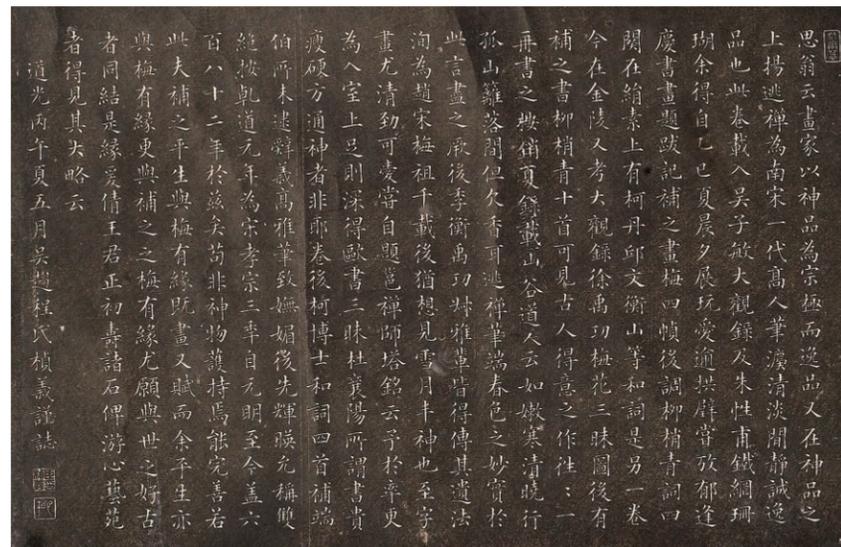


图7 《四梅图》拓本程桢义跋 苏州博物馆藏

作，往往一再书之。按《销夏录》载山谷道人云：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逃禅笔端春色之妙，实于此言尽之。厥后季衡、禹功、叔雅辈皆得传其遗法，洵为赵宋梅祖。千载后，犹想见雪月丰神也。至字画尤清劲可爱，尝自题《邕禅师塔铭》云：“予于率更为入室上足”，则深得欧书三昧，杜襄阳所谓“书贵瘦硬方通神”者，非耶！卷后柯博士和词四首，补端伯所未逮，辞意高雅，笔致妩媚，后先辉映，允称双绝。按：乾道元年为宋孝宗三年，自元明至今，盖六百八十二年于兹矣。苟非神物护持，焉能完善若此。夫补之平生与梅有缘，既画又赋，而余平生亦与梅有缘，更与补之之梅有缘，尤愿与世之好古者同结是缘，爰倩王君正初寿诸石，俾游心艺苑者得见其大略云。（图7）

显而易见，确实是程氏请王正初将《四梅图》卷刻石传布的，刻石的时间当在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以后，殆卷中道光二十六年（1846）七月十五日黄均（1775—1850）所书四行题记也在拓本上。在程桢义跋文中，他对郁逢庆《书画题跋记》著录的绢本《四梅图》双胞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也言及，他获得《四梅图》卷的时间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夏，时距陆恭（1741—1818）之卒将近三十年。程桢义富藏书画刷迹，就目前所见者均止钤印记而不落墨，唯一仅见《四梅图》后有此长跋，其所用“梅寿堂”、“一卷梅花之室”等斋号似也由此《四梅图》卷子而来，足见其对此卷之珍视。程跋墨迹今不见于原卷后，颇为可惜，幸拓本尚存虎贲之似，借此可略窥其书法面目。

第三，拓本未涉及的一次程桢义和友人观赏《四梅图》的雅集活动。程桢义、黄均、潘遵祁等人跋《四梅图》之墨迹，已不见于原卷，全赖拓本留其概貌，故拓本之价值有原卷所不能完全代替者。不过，《四梅图》卷上，也有

拓本所没有的观款三行：

咸丰壬子孟春下浣四日，虞山胡君艺香宴集望禹书屋，心柏携此卷出示。时梅花满屋，与此卷互相辉映。觉活色生香，益令人神往于罗浮、姑射间也。同观者吴县汪水部藻，黄寿凤谨识。

时在咸丰二年（1851）正月二十四日，程桢义携《四梅图》卷赴侨居苏城的常熟籍画家胡骏声^[24]的望禹书屋，与汪藻、黄寿凤等雅集，一同欣赏此卷。黄寿凤篆书题款，记其事。一年零九个月后，程桢义便积劳成疾，赍志以歿。

第四，《四梅图》卷从程桢义梅寿堂散出，转入潘氏香雪草堂、筑四梅阁储之的过程中，潘遵祁（1808—1892）曾有与《四梅图》卷失之交臂的一段往事。在程氏所刻拓本上，留有一段道光二十六年（1846）孟冬潘遵祁的题跋，记述其颠末：

此卷向藏余外祖谨庭先生松下清斋，余生也晚，不及请而读之。洎余稍知翰墨则已落他人手，物色之有年，不得一见为恨。乙巳冬，归自都门，晤心柏员外，纵论书画，知鉴古益精，请观所藏，则此卷哀然为清秘阁中之冠。展玩数四，如睹奇珍，得慰十余年来梦想之劳。因假归案头，寻味累日而归之，盖所得已不浅矣。昨心柏以钩勒拓本见贻，属附款识，爰书此以志余瓣香之诚，得厕名卷尾为幸。至此卷画品神逸，词翰双美，卓绝千古，无俟余之多赘云。

从上文中可知，潘遵祁在外祖父陆恭去世十余年后，一直在寻觅《四梅图》卷，却未见下落。道光二十五年（1845）冬，他从京师南归，访程桢义观其藏品，朝思暮想的《四梅图》卷竟然一下出现在眼前，令他既惊喜又失落，乃借回家中欣赏一段时间。次年，程桢义赠以此卷墨拓本，潘遵祁为题一段，程氏又将潘跋刻石。然则，《四梅图》拓本的刊刻，并非一次完成，

至少程桢义及其友人题跋刊刻，应在程氏以拓本赠人之后，故认定《四梅图》卷拓本传拓之先后，可用包不包含潘遵祁等题跋来区分。

从《四梅图》卷目前的装潢来看，当年程桢义并未将自己及友人的题跋装入拖尾，故其手跋墨迹在此卷从程氏转入潘氏之际，就与原卷分开。从苏州博物馆藏潘遵祁旧蓄《四梅图》拓本（应即程氏赠潘氏者）来看，同治间，潘氏购得《四梅图》原卷后，潘遵祁也曾加题，即拓本中所夹潘氏墨迹一纸，首段系追和扬补之《柳梢青》词：

柳梢青。追和扬逃禅四梅花原韵。

一别青山，重寻红萼。三年遥隔，旧日苔枝。依然缀玉，翠禽相识，为谁含恨风尘。却自把春心护惜，欲诉离愁，窗前无奈，嫩寒犹勒。（未开）

芳事评量，口脂入画，想像轻妆，竹里无人，春风暗觉，一阵吹香，依稀茅舍遮蔽，恰好句搜来绣肠，幽思难禁，须拼早起，日绕疏廊。（欲开）

瘦筇闲搭，满林香雪，晴烘一霎，径

曲才迷，峦迥又见，万横周市，休猜篱落敲斜，应记得冰霜惯压，不似桃花，春江消息，暖随浮鸭。（盛开）

更觅繁枝，余香犹在，欲步偏迟，梦醒梨云，春深杏雨，直恁纷披，天涯难问归期，听羌管声声暗，悲只有幽人，还携鸦嘴，不负年时。（收残）

时在同治九年（1870）庚午立春后五日，后又于仲冬时节在光福四梅阁作诗并跋云：

结庐傍香雪，清气入寤寐。晓山塞屋角，林樾写其态。青黄杂紺紫，笔笔似名绩。迤迤接村墟，霜花弄琐碎。湖光忽掩映，凝茫露鸦背。层峦断断续，仄径传磴。一塔烟中明，影落窗户内。灵芬贮小阁，熏香破清睡。逃禅不可作，高节未云坠。所嗟流风渺，韵事袭先辈。素壁张横枝，清词动幽吹。遥遥七百年，尚友幸披对。枫叶脆有声，梅花袞含昧。俯仰愧虚襟，孤吟聊自遣。

扬逃禅《四梅花》卷，旧藏外大父陆谨庭先生家，石庵相国题其阁。余既筑室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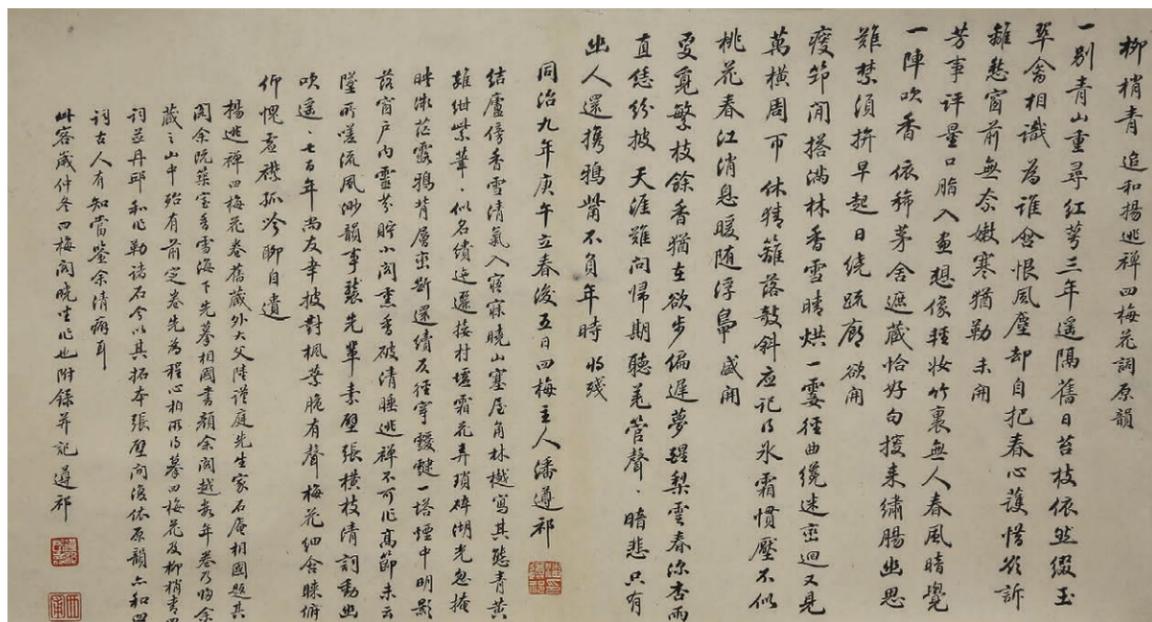


图8 《四梅图》拓本潘遵祁跋 苏州博物馆藏

雪海下，先摹相国书颜余阁，越数年，卷乃归余，藏之山中，殆有前定。卷先为程心柏所得，摹四梅花及柳梢青四词，并丹邱和作勒诸石。今以其拓本张壁间，复依原韵亦和四词。古人有知，当鉴余清癖耳。（图8）

潘遵祁在跋中也提及，摹刻《四梅图》卷者正是程楨义。此卷后从潘氏四梅阁，转归顾氏过云楼，其间尚有一段公案，因与本文主题无涉，暂从略如。

纵观程楨义短暂的一生，既无显赫的功名，又没有著述传世，惟承继先人家业，于宗族事业尽心竭力，故世人仅知其营造庄祠、续修族谱，而鲜论及其收藏。程氏生前，于而立之年已厕身大收藏家之列，藏品之精且富，实已超越潘氏、顾氏诸家，一时罕匹，冠于吴中，不虞其积劳猝逝，迭遭变乱，家人凋零，半生所蓄随即星散，真如烟云，令人叹息。

（作者为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注释：

[1] 此文刊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2、13合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修订后收入拙著《佣书读画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

[2] 王月轩收藏之名，有《契兰堂所见书画》为证，其生平则阙而无闻。据湖南省博物馆藏褚摹《兰亭》卷、上海博物馆藏吴镇《竹谱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沈周《仿董巨山水图》轴及私人藏恽寿平《哭王奉常断句二十四章》册所钤“长洲王时新月轩氏藏”印，知王月轩名时新，余仍俟考。

[3] 张华庆、李冰编《杨仁恺谈书法鉴定》，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第305页。另有倪进《中国书画鉴定学》后附《中国历代书画鉴藏家常用印表》一种，亦录程楨义，但全剽袭杨氏之作，特此说明。

[4] 衣若芬《行云流水：〈答谢民师论文帖卷〉》，见《书艺东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37页。又，缪曰藻（1682—1761）为康乾间人，未入道光。

[5] 衣若芬《〈李白仙诗卷〉的流传与递藏》，见《书艺东坡》，第278页。

[6] 程楨义字号印中，别号均作“心柏”，未见“星

柏”。“翼初珍玩”印文，仅见于2020年香港佳士得秋拍祝允明《桑寄生传》卷上。

[7] 冯桂芬纂修《苏州府志》，清光绪七年刻本。

[8] 叶昌炽《奇觚廋文集》卷下，1921年刻本。

[9] 章程《苏州程氏》，载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苏州史志资料选辑》（2004年）。

[10] 顾文彬《过云楼家书》，文汇出版社，2016年，第285页。

[11] 同上，第315页。

[12] 同上，第349页。

[13] 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一“五代董北苑《夏山图》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14] 戴熙《习苦斋画絮》，清光绪十九年刻本。

[15]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16] 同上，第8页。讨论《与谢民师书》卷者甚多，可参看衣若芬《书艺东坡》中“行云流水：〈答谢民师论文帖卷〉”一文。

[17] 同上，第153页。

[18] 李军整理《吴大澂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第24页。

[19] 此卷流传情况，可参看衣若芬《〈李白仙诗卷〉的流传与递藏》，收入其《书艺东坡》。

[20] 聂崇正主编《晋唐两宋绘画·花鸟走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26—27页。傅东光《扬无咎〈四梅图〉卷解读》，《紫禁城》2005年第12期，第78—79页。郑重《书画经典与印记流传》，收入《百里溪丛札》，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82—83页。刘鹤《南宋扬无咎〈四梅图〉研究》，见《人文学术——东方与西方》，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1—229页。倪纯如《扬无咎〈四梅花图〉上的鉴藏款印对绘画表现方式的影响》，《中国书画家》2015年第3期，第119—121页。

[21] 傅东光《四梅花图》，收入周林生主编《宋元绘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9页。

[22] 详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6%A2%85%E5%9B%BE/2045759?fr=aladdin> “四梅图”词条下“历史传承”一项。

[23] 吴霖《山水情未了》，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24] 胡氏生平，详见李军《胡骏声祖孙的生平与肖像画创作考辨》，载《艺术工作》2020年第3期，第62—74页。

新见《查士标临米芾信札长卷》小考

——兼谈“西泠八家”蒋仁与平圣台的交往

□朱琪

2019年年初，海上篆刻家张遴骏先生告知其友人藏有查士标临米芾信札长卷，后有蒋仁长跋，或可补拙著《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资料之阙。在张先生热心帮助下，得窥是卷全貌，其中蒋仁长跋洋洋数百言，与其印章边跋多有印证，确实是一份珍贵的资料，对蒋仁家世、生平、交友等多方面研究皆有所补益，对清代画史研究也有一定价值。今不揣谫陋，着重就蒋仁跋文略作深入探考。

据张遴骏先生转告，此作为广东藏家在2011年11月香港佳士得拍卖所获，由于当时图录仅印出查士标本幅与梁同书跋，藏家亦未知尚有其他墨迹。数年后展玩之时，意外发现距梁同书跋文后数米空白的卷末，竟还有查虞昌、蒋仁、平圣台题跋，由于空白纸幅过长，而为经眼者忽略，可谓意外之喜。

此卷系查士标书法精品（图1），所临为米芾信札五通，后有查氏题记一段，卷首钤“梅壑”长方朱文印，落款后钤“查二瞻”方形朱文印：

敬闻命。此石亦不恶。业镜在台州耳。伯充台坐。芾顿首。

芾惶恐，蒙惠柑，珍感、珍感。长茂

者适用水煮起，甜甚。幸便试之。余卜面谢，不具。司谏台坐。芾顿首。

芾再启。贺铸能道行乐慰人意。玉笔格十袭收秘，何如两足其好，人生几何，各阙其欲。即有意，一介的可委者。同去人付子敬二帖来授，玉格却付一轴去，足示俗目。贺见此中本，乃云公所收纸黑，显伪者。此理如何，一决无惑。芾再拜。

苏氏《王略》右军帖，获之。梁、唐御府跋记完备。黄秘阁知之，可问也。人生贵适意，吾友覩一玉格，十五年不入手，一旦光照宇宙，巍峨至前，去一百碎故纸，知他真伪，且各足所好而已，幸图之！

丹阳米甚贵。请一航载米百斛来换玉笔架，如何。早一报，恐他人先。芾顿首。

米襄阳九札真迹，久藏新墟吴氏，今归江一石小年斋，余得数见，亦窥一斑。此米书之煊赫有名者。士标临并识。

所临数札，依次为米芾《业镜帖》《惠柑帖》《玉笔格帖》^[1]《适意帖》^[2]《丹阳帖》，原帖今俱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查士标题记来看，其友江一石藏有米芾信札九通，他数度观摩真迹，因此选择其中“煊赫有名者”五通，临摹



图1 查士标 临米芾信札长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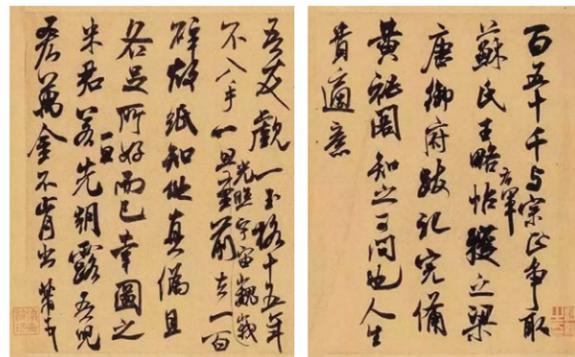


图2 米芾 适意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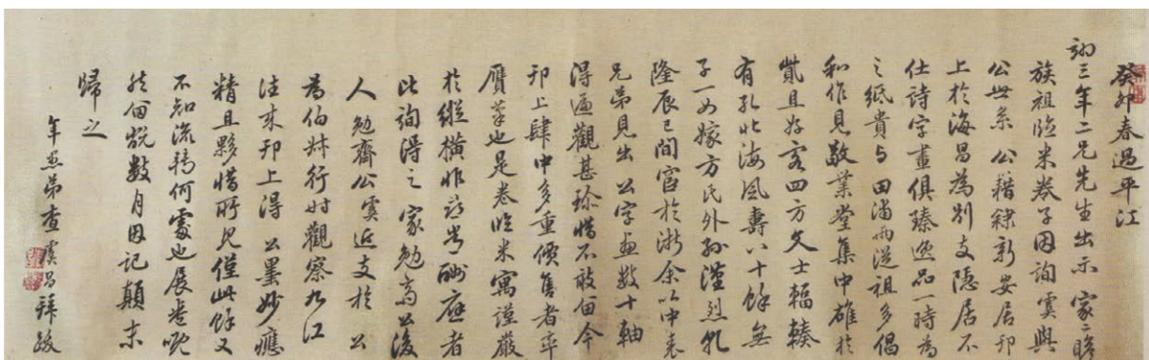


图3 查士标《临米芾信札长卷》查虞昌跋

成此卷。

查士标（1615-1698），字二瞻，号梅壑、梅壑散人、懒老、后乙卯生。新安（今安徽休宁）人，后流寓江苏扬州、镇江、南京一带。查士标富收藏，精鉴别，擅画山水，为海阳四家之一。与孙逸、汪之瑞、弘仁等并称为清初“新安四大家”。其山水法倪、黄，笔墨疏简，风神萧散，气韵荒寒，晚年画风有所改变，直窥元人堂奥。又负书名，行、草见长，于米芾、董其昌得力尤多，行笔俊逸豪放、神韵深邃，时谓“米、董再生”。

查士标书法本钟情米襄阳，此卷临摹自真迹，笔法精熟，可谓形神兼具。所临间有省文，如《业镜帖》末落“彦臣如何”。与米芾《适意帖》（图2）原帖对比，则阙首句“百五十千，与宗正争取”，复少末句“米君若一旦先朝露，吾儿吝，万金不肯出”，又将原帖中旁注移入

正文。

此卷为“西泠八家”之一蒋仁好友平圣台之弟翊三所藏，据查虞昌跋可知为平翊三得于查培继（勉斋）后人，系“寓谨严于纵横，非寻常酬应者”。查虞昌乾隆四十八年（1783）原跋（图3）如下：

癸卯春过平江，翊三年二兄先生出示家二瞻族祖临米卷子。因询虞与公世系，公籍隶新安，居邗上，于海昌为别支，隐居不仕。诗、字画俱臻逸品，一时为之纸贵。与田浦两从祖多倡和作，见《敬业堂集》中。雄于赏，且好客，四方文士辐辏，有孔北海风。寿八十余，无子，一女嫁方氏，外孙汉烈，乾隆辰巳间宦于浙。余以中表兄弟见，出公字画数十轴，得遍观，甚珍惜，不敢留。今邗上肆中多重价售者率履笔也。是卷临米，寓谨严于纵横，非

寻常酬应者比。询，得之家勉斋公后人。勉斋公，虞近支，于公为伯叔行，时观察九江，往来邗上，得公墨妙应精且夥，惜所见仅此，余又不知流转何处也。展卷慨然，留玩数月，因记颠末归之。年愚弟查虞昌拜跋。

卷后又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平圣台、乾隆五十年（1785）梁同书、蒋仁跋。梁同书跋文（图4）如下：

米札为炫赫有名之书，此卷亦可谓炫赫有名之作。昔人云下真迹一等，不足方也。宋吴云壑学米，形似神似，五百年来只此一人，所流传者亦只数行，今《三希堂》《快雪堂》诸刻同也，然笔端犹不免

脂腴气。若先生此书，岂特与之抗衡已耶，可宝也。乙巳三月，山舟同书识。

梁跋中所云吴云壑为南宋吴琚，他对米芾书法五体投地，并穷其一生矢志不渝地模仿米芾书法。梁同书称查士标此卷脱尽后人学米的“脂腴气”，一方面固然是出于对查氏学米用笔清逸，格调高雅的盛誉，但也点破后世临摹、翻刻米芾书法多偏丰腴的赋味。

当然，诸跋之中，尤为可宝者，当是最新发现的数米白卷之后的蒋仁题跋（图5）。蒋仁跋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廿八日，时年四十三岁。文曰：

梅壑翁与先曾祖善，余家藏其迹不啻牛腰卷，内仿清閟《十万图》、临柳《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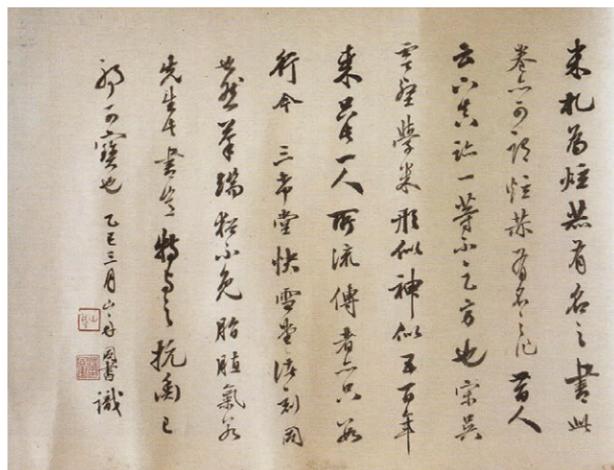


图4 查士标《临米芾信札长卷》梁同书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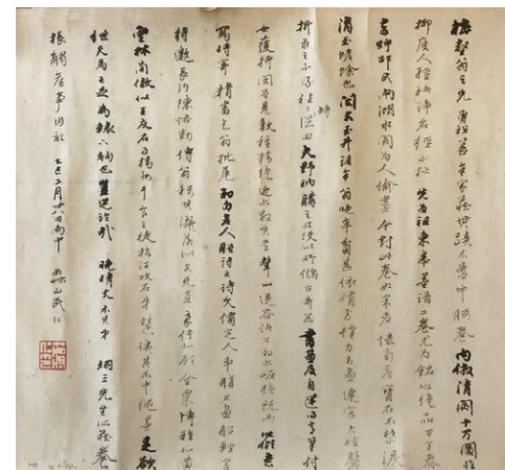


图5 查士标《临米芾信札长卷》蒋仁跋

经》、褚《净名经》、小松先曾祖《东皋墨谱》二卷，尤为铭心绝品。甲午春，寄贮邵氏南湖水阁，为人偷尽。今对此卷，如米老忆南唐宝石，不禁泪滴玉蟾蜍也。闵丈玉井语余，翁晚年贫甚，依婿，方肆力于画，达官大姓罄折求之，不得，往往转从田夫野衲购之。临没，以所储古奇器、书画及自运得意笔付女护持。闵曾见数种，精绝，近亦散失矣。声山、退谷诸公，初亦倔强，既而必倾意写，时寄精画乞翁批尾。初白老人赠诗云：“诗文价定人争购，书画船轻客待邀”。长沙陈恪勤传翁，称其洒落似史廷直，豪侠似顾金粟，博雅似黄云林，简傲似王友石。而扬州耳食之徒，检汪攻石牙慧，讥其不中绳墨，是欲继天马之足为辕下驹也，岂定论哉。晚晴丈示其弟翊三先生所藏卷，根触旧事，因记。乙巳二月廿八日雨中，女床山民仁。（钤“蒋仁印”白文印）

从此跋可知，蒋仁曾祖蒋灿^[1]与查士标交往颇深，所藏查氏书画亦夥。乾隆三十九年（1774），蒋仁将家藏书画寄贮邵氏南湖水阁，为人偷尽。这一事件对蒋仁而言，不啻于人生重大打击。世家所藏书籍、字画，在古代往往代表着一个家族的文脉传承，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文化根柢。从物质层面来说，即使在家族没落之际，这些书画也可以转化为维系家族经济运转的备用金，甚至有可能帮助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家藏书画的散失，

毫无疑问是对蒋仁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一方面造成其内心世界的消极与封闭，同时也对其家庭的生活乃至生存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刻“磨兜坚室”一印（图6）的边款中，遭窃一事已被刻入蒋仁自用印“磨兜坚室”边款中：

家藏胡恢隶书《欹器帖》，纸墨黯澹，有洪容斋、范至能、张温甫、赵子固、贯酸斋、滕用衡、都元敬、郭允伯、顾宁人九跋。又祝希哲小楷《金人铭》长卷，有莫中江、董香光、李檀园、邛湛若、申观仲及先官詹公跋尾。甲午春，余自褚堂复居东皋，拾宋元明国初诸家铭心绝品书画二百八十余种，并□两府无银锭痕，山和尚锦装潢不全《阁帖》九卷、初搨《绍兴米帖》四卷，寄贮茗月君十仙绘蝠楼，不知谁为桓大司马孽子，巧偷殆尽，胡、祝二迹，亦堕劫内，不胜哀肠泪滴蟾蜍之感。^[4]

两文对照，可见偷窃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大体一致，只是跋文云“寄贮邵氏南湖水阁”，或与印款所说“十仙绘蝠楼”为同一处。此次事件，蒋仁损失宋至清初书画、法帖二百八十余种，自然也包含查士标为其曾祖蒋灿所作大量书画。故十年之后，蒋仁在题跋查卷时情不自禁，发出“如米老忆南唐宝石，不禁泪滴玉蟾蜍也”的喟叹。

跋文的末段，直书闵华^[5]告知蒋仁关于查士标的画史掌故，并提出对查画的独到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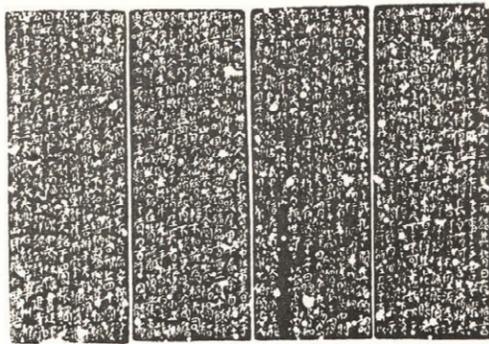


图6 蒋仁 磨兜坚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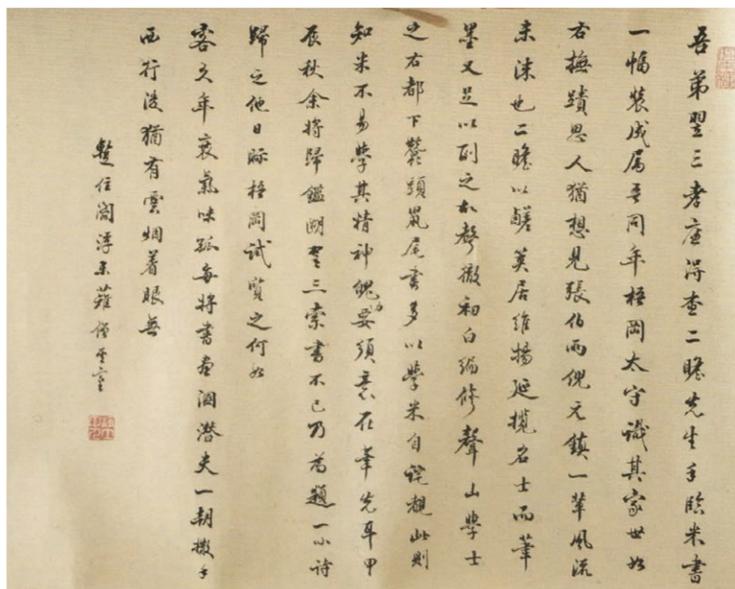


图7 查士标《临米芾信札长卷》平圣台跋

尤具史料价值。查士标晚年贫困，依靠女婿家生活，肆力于绘画，去世前又将所藏古董、书画与自作精品交付女儿保存，后皆散失。查升、汪士鋐时常寄去绘画精品求其跋尾。查慎行赠诗、陈鹏年作传，皆极为称赏，然而扬州有人道听途说，信奉汪肤敏贬低查士标之语，认为其“不中绳墨”，实为愚妄，蒋仁对此予以驳斥。

据文献记载，蒋仁于书法、篆刻之外兼工绘事，但其绘画似未得见^[6]。如《墨林今话》载：“兼写山水，不多作也。”《清代画史增编》云“写山水存幽逸趣，惜不多作。”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云“写山水有幽逸趣”，并举陈诗庭孝廉所藏蒋仁摹造像直幅行书长跋，并印章七方，“书画均具金石气”。^[7]从此跋来看，虽然蒋仁绘画作品未见，但他对绘画的见解十分精深，应当是通晓绘事的。

蒋仁跋后又有平圣台跋文（图7）：

吾弟翊三孝廉得查二瞻先生手临米书一幅，装成属吾同年梧冈太守识其家世如右。抚迹思人，犹想见张伯雨、倪元镇一辈风流未沫也。二瞻以醴英居维扬，延揽名士，而笔墨又足以副之，故声微初白编

修、声山学士之右。都下蚕头鼠尾书多以学米自诧，覩此则知米不易学，其精神魄力，要须意在笔先耳。甲辰秋，余将归鉴湖，翊三索书不已，乃为题一小诗归之，他日眎梧冈，试质之何如。客久年衰气味孤，每将书画溷潜夫。一朝撒手西行后，犹有云烟着眼无？暂住阁浮未薙僧圣台。（引首钤“如来种”朱文印，后钤“净土中人”白文印）

关于平圣台，拙著《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对他与蒋仁的交往已有所叙述，这里不妨再作一番详细梳

理。平圣台，字瑶海，号晚晴，又号火莲、确庵（斋）。斋名妙香盒、清娱阁、馀盒。山阴人。乾隆甲戌（1754）进士，改庶吉士，出为金溪知县，历官广州府同知。平圣台工诗文，《梧门诗话》载：

平瑶海甲戌会试，出钱文敏门下。公尝称其馆课“一钩杨柳外，彷彿上弦初”。及公己卯典试江西，瑶海由庶常改县令，奉调入闈。公途中见新月，怀瑶海云：“凉风已见催秋去，碧汉何尝待客还？不信一钩杨柳月，此诗只令老途间。”（《梧门诗话》卷四）

可知平圣台出于钱维城门下。他与袁枚、彭绍升、黄易、王文治、蒋士铨、朱筠、余大观等均有交往。袁枚有《答平瑶海书》《到镜湖寓庵访平瑶海太史临别有赠二首》等诗赠之，《随园诗话》亦有论及。又嗜佛，蒋仁晚年奉净土宗，即深受其影响。长洲进士彭绍升曾有《题平瑶海僧服小照》云：

夫子不识字，达摩不会禅。法尚不可得，而我何有焉。智人了斯义，因应随方圆。峨冠拥讲席，秃顶栖蒲团。一心俄转

变，幻有传毫端。反穷念未生，谁实司其权。喧寂两无得，豁尔离言诠。俯仰天地外，非鱼复非鸢。卷图度高阁，一枕松风眠。^[8]

富春山人单昭《题徐龢听佛图》云：

休从起灭看纷纷，六字分明说与君。
要识观音门里事，阿师何不自闻闻。^[9]

单昭精通佛理，与蒋仁、平圣台为禅友。当时人称金农之书法、奚冈之绘画、杭世骏之酒与单昭之禅著为“浙江四怪”。毛琛《和粤秀山长冯鱼山比部梅花十首原韵》对平圣台的“徐龢”也有记载：

远树冥冥作雪猜，青天海色小蓬莱。
云于玉筍峰头白，花自西施渡口开。村酒兴来谁酩酊，衲衣行处惹梅苔。谈空齿冷徐茶老，强把青莲火里栽。（山阴平瑶海府丞晚耽禅酒，号火莲居士，筑徐庵于镜湖佳处，种梅百本，常醉余花下。）^[10]

蒋仁先后为平圣台刻过“如是”（图8）、“火中莲”（俱1787年作，图9）、“妙香龢”（1785年作，图10）三方印章，皆为佛家语。他是蒋仁晚年过从甚密的好友，曾从山阴远过吉罗庵访蒋仁，蒋仁曾作《山阁雨中喜邵四右庵至即送晚晴山

长还山阴叠涪翁仁亭诗韵》一诗答赠，诗云：

昏沉湖上雨，舒卷云中山。云山抱城走，杰阁凌朝寒。笠屐天际落，古道君一斑。不惮峻岭滑，送客吴越关。行衣尽岚气，笑语倚危栏。相于岁晏里，听雨围炉间。俄顷雨声止，霁色明江端。贺监从此去，中流应仰观。^[11]

蒋仁中年也曾客居其家，如他为邵志纯（怀粹）所刻“康节后人”印（图11），即为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六日客其清娱阁上所作，款曰：

怀粹邵君属制康节后人印。迟一年，平氏晚晴草堂清娱阁上篆寄之，阁俯越州南塘，所谓鉴湖一曲也。邻快阁，园峰嶙嶙若云门宛委，玉筍岫兮窈窕，孔静幽墨。视吾家浓抹淡粧西子，尹邢不定。乾隆乙巳七月六日，女床居士蒋仁记。



图8 蒋仁 如是



图9 蒋仁 火中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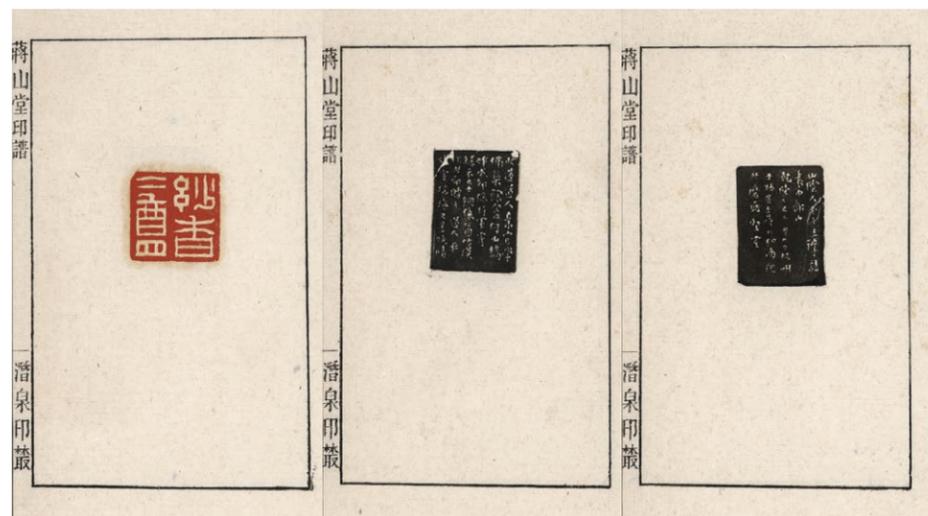


图10 蒋仁 妙香龢



图11 蒋仁 康节后人

是年十一月七日，蒋仁又为平圣台刻“妙香龢”印。款文：

火莲道人弃官学佛，筑徐龢何山桥畔。成都保将军寄绿衣大士铜像，仁因仿汉作此印赠之，道人平姓字瑶海，又号晚晴，山阴人，今之王摩诘、袁中郎也。乾隆乙巳十一月七日，杭州女床居士蒋仁和南记于磨兜坚室。

蔡英有一段记述，恰可与此印证：

瑶海先生晚岁自号火莲居士，筑室鉴湖之滨，颜曰“徐庵”，营生圻其右，与方外人焚修其中，顾未免为尘累扰其清思。年踰七十而卒。^[12]

印款中所说“成都保将军”为保宁，时任成都将军，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四川总督，他曾遣人送绿衣观音铜像，供于平圣台的徐龢之中。余大观有《徐庵诗为平太史瑶海作》四首，其中第三首曾述及此事：

入门老屋低，宛然小精蓝。慈容瞻大士，法相来海南（川督保公遣人送越，迎供庵内）。开帘出迎客，居士正罢参。^[13]

袁枚与保宁、平圣台为好友，乾隆壬子（1792）春，他去镜湖拜访平圣台，《到镜湖寓庵访平瑶海太史临别有赠（其一）》也有记述：

檐响客将到，开窗君已迎。湖宽多得月，地僻只闻莺。松学苍髯色，诗分贝叶声。观音含笑坐，得句定先呈。（寓庵供绿衣观音一座。）^[14]

这方“妙香龢”原印面为人磨去，先后被补刻为“水莲道人”“火莲道人”，现收录于《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中“火莲道人”印即为此原石，但印面已非原刻。关于这一段秘辛，笔者已在《真水无香》一书中有详细说明，读者自可参阅，兹不赘述^[15]。

从平圣台为查士标手卷题跋的署款“暂住阎浮未薙僧”来看，“阎浮”即“赡部”。须弥山南方的四大部洲之一南赡部洲，生长许多南赡部树，因此得名，后泛指人间世界。“未薙僧”则可见其虽未剃度，心已为僧。平圣台由入禅佛而弃官，其思想、行为颇值得探究。蒋仁友人之中，平圣台、彭绍升、单昭三位，入佛最深。他们代表了清代士人（或曰知识分子阶层）中笃信佛教、精究佛理的典型，他们的文学、艺术，乃至生活方式，都深受佛学影响，是古代文人社会生活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生动个案。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注释：

[1]《清鉴堂帖》称《贺铸帖》；吴其贞《书画记》称为《米芾再启帖》。

[2]又称《玉格帖》。

[3]蒋燦，号素庵。康熙年间任承德郎、徽州省通判署婺源县事。参阅朱琪《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6页。

[4]因原款漫漶，释文不排除可能发生误读现象。

[5]闵华（1697—1773后），字玉井，号廉风，江都人。有《澄秋阁集》。

[6]朱琪《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46页。

[7]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卷三，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江南图书馆石印本。

[8]彭绍升《观河集》，清光绪四年刊本。

[9]单昭《小安养斋膳稿》，清嘉庆刊本。

[10]毛琛《侯龢膳稿补编》卷下，清道光刊本。

[11]吴颢《杭郡诗辑》，同治甲戌同里丁氏重校刊本。

[12]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九，清光绪十六年刊本。

[13]余大观《菘塍斋遗稿》卷下，清嘉庆刊本。

[14]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四，清刊本。

[15]参阅朱琪《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2—270页。

《铜官感旧图》旧题及伪作考

□ 尧育飞

光绪二年（1876），曾为曾国藩幕僚的章寿麟（1832-1887）返回故乡长沙，道经靖港，于舟中遥望铜官山，忆起昔年随曾国藩征战此地，并援救曾国藩一事，“怆然动泰山梁木之感，故为兹图而记之”^[1]。此后，章寿麟以图为媒介，广征题咏，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人先后为其题写序跋。章寿麟死后，其子章华、章同继续征集题咏，共得吴汝纶、林纾、蔡元培、徐世昌、陈宝琛、文廷式、江标、樊增祥、康有为、章士钊等晚清名流一百余人的题跋190题。宣统二年（1910），章华、章同兄弟将所征题咏108题，分四册由章氏益山会馆石印行，题为《铜官感旧集》^[2]。是书印行后，章氏兄弟征集题咏的活动仍在继续。2008年，湖南谭国斌兴兰堂艺术陈列馆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铜官感旧图》所有原件^[3]，后由岳麓书社于2012年影印出版，名为《铜官感旧图题咏册》。由影印件可知，在宣统二年本之后，章氏兄弟陆续又征集得82篇题跋，分4册装池^[4]。

《铜官感旧图题咏册》所收题跋自光绪二年（1876）章寿麟自记至可考的柯绍忞所题庚午年（1930）^[5]，时间跨度超过50年。题咏者名流众多，光绪至民国旧体文学翘楚人物几乎都与其列，所收题跋诸种文体兼备，诗、文、词兼具，作者各逞其长，实为晚清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宣统二年石印本《铜官感旧图题咏册》

版侧题“铜官感旧集”，可见在章华、章同兄弟看来，题咏册俨然已可称为“文集”。而作为晚清文化史上著名的手卷，《铜官感旧图》在命名及图画真伪上仍有诸多疑点未得有效梳理，故略述如下。

一、从《铜官援溺图》到《铜官感旧图》：手卷的早期传布与更名

章寿麟这幅手卷在后世以《铜官感旧图》闻名，但阅读原件中李元度（1821-1887）题词《题铜官援溺图》，发现另有一说：

《铜官援溺图》者，吾友章价人太守之所追绩也。咸丰四年，曾文正公治水陆军讨贼，余与今浙抚陈公士杰暨价人入其幕，时价人年甫冠也。……光绪丙子，余客金陵，文正薨四年矣。晤价人，握手话旧，价人出《铜官援溺图》属题，余诺之而未及为。越五年，价人宅忧归，乃得补书其简首。……平江李元度撰并书，时辛巳长至后三日。^[6]

很明显，光绪丙子（即光绪二年，1876年）章寿麟（字价人）呈递给李元度的手卷名为“铜官援溺图”，但李元度一时未予以题咏，五年之后章寿麟丁忧回乡，李元度方才补题交给章寿麟。然而为何整个手卷题咏中仅李元度一人将

图画称为“铜官援溺图”，而其他所有人都称图画为“铜官感旧图”。最令人惊奇的是，章寿麟自记一文名《铜官感旧图自记》，他记载这幅画的绘制缘起为：

光绪丙子（1876）秋，予归长沙，道靖港，舟中望铜官山，山川无恙，而公已功成事竣，返马帝乡。惟时秋风乍鸣，水波林壑尚隐隐作战斗声，仿佛公之灵爽呼叱其际。因不禁俯仰畴昔，怆然动泰山梁木之感，故为兹图而记之。……长沙章寿麟自记。^[7]

章寿麟记述因山河之感而生怀古之思，故作是图，但文中并未言图名称，仅题名《铜官感旧图自记》揭示图名当为“铜官感旧图”。由于“先人手泽及同时侪辈之作，皆列首册”^[8]，因此我们根据《铜官感旧图题咏册》与《铜官感旧集》，将与章寿麟同时辈人所记题图名称及时间排列如下：

人物	题记时间	图名
章寿麟 (1832-1887)	不确 (疑为1876)	《铜官感旧图》
李元度 (1821-1887)	光绪辛巳 (1881)	《铜官援溺图》 /《铜官感旧图》
薛时雨 (1818-1885)	光绪八年 (1882)	《铜官感旧图》
陈士杰 (1825-1893)	光绪九年 (1883)	《铜官感旧图》
左宗棠 (1812-1885)	光绪九年 (1883)	《铜官感旧图》
梁肇煌 (1827-1886)	不确	《铜官感旧图》
卞宝第 (1825-1893)	光绪丁亥 (1887)	《铜官感旧图》
王闿运 (1832-1916)	不确（但在章寿麟1887年逝世前）	《铜官感旧图》

通过这个排列，有两点信息很明确，第一，李元度是章寿麟以外，第一个看到图画并予以题咏者；第二，除李元度外，章寿麟同时代人都称此图为《铜官感旧图》。由此也有两点疑问：第一，从光绪丙子（1876年）绘制图画后，为何直至1881年，才有李元度的题咏，中间五年缘何无人题词；第二，如果李元度所见图画名为“铜官感旧图”，为何在题词中他要称图画为“铜官援溺图”？第三，如果李元度所见图画名为“铜官援溺图”，那么章寿麟的《自记》时间就存在问题，而《自记》的题名也可能是后来改窜而成。

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钥匙藏在宣统二年（1910）版《铜官感旧集》中，收录于该书的李元度题词为“题铜官感旧图”，文中涉及图名的两处均为“铜官感旧图”^[9]。然而细观题记“铜官感旧图”（图1）开篇“铜官感旧图”诸字，



图1 宣统二年本李元度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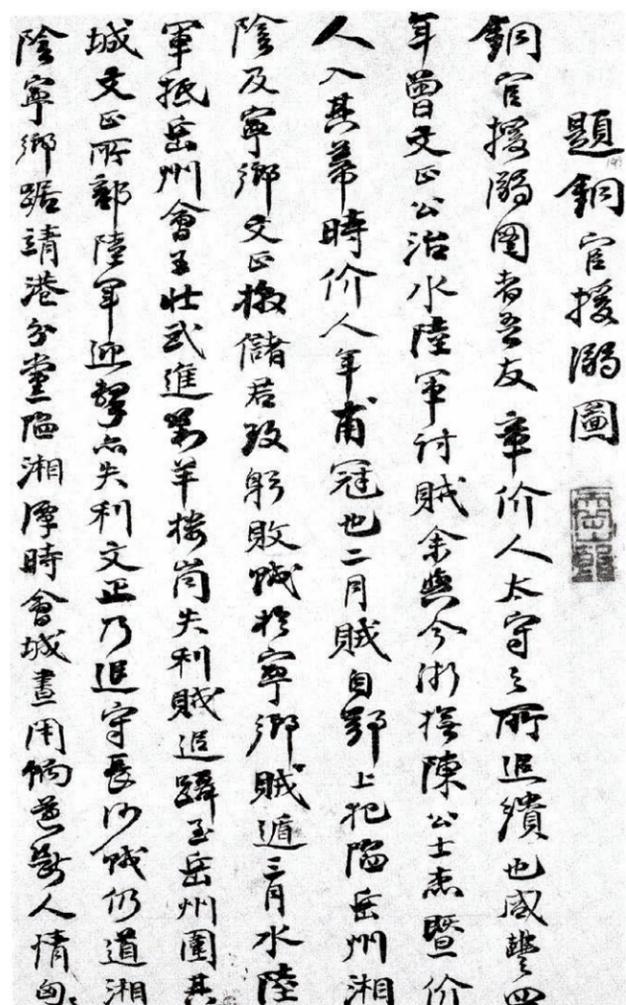


图2 李元度题词原件

可清楚发现正文中“旧”字与“图”相连的带笔过于刻意。再与原件同一位置“铜官援溺图”（图2）比较，不难发现“旧”字乃是刻意补版所致。由此看来由原件到宣统元年的公开出版，章氏兄弟对原件进行了修改，即将“援溺”二字改作“感旧”。由此推断，李元度所题原件当为“铜官援溺图”。章氏兄弟改窜李元度题词也颇易理解：四册题咏册中人都称“铜官感旧图”，尤其是其父章寿麟也称“铜官感旧图”，故他们臆测肯定是李元度笔误，因而径改。然而，李元度果然误书吗？

安徽全椒人薛时雨的题记中如是写道：

昔章君价人牧吾滁，滁之来者，辄贤

君弗置。余时主江宁讲席，未之见也。而曾文正公知余籍君部，亦数数贤君，余于是心焉识之。未几，君改注来江宁，始与余见，辄喜一见如所闻。君历司江岸樵务，每主会垣，必访余，握手慰劳，欢若平生，十年来如一日也。客秋，君以忧归，今春重至江宁，复与余见，出途中所作《铜官感旧图》见示，而属余序之。……光绪八年岁次壬午仲春之月，治愚弟全椒薛时雨拜序。^[10]

薛时雨的题记透露重要信息，即《铜官感旧图》是章寿麟在光绪七年（1881）秋天至光绪八年（1882）春天丁忧的旅途中创作的，只不过无从进一步断定是在光绪七年秋天回长沙的途中，还是在光绪八年春天返回江宁的路上。但这条信息与章寿麟《自记》中所云光绪丙子（1876）年作图显然不合。再联系李元度题词，则事实很明显：即光绪丙子（1876）章寿麟曾因铜官景象有感而绘图，光绪七年秋至光绪八年春间章寿麟又作一图。复考李元度题词云：“光绪丙子，余客金陵……价人出《铜官援溺图》属题，余诺之而未及为。越五年，价人宅忧归，乃得补书其简首。”光绪丙子为1876年，越五年章寿麟丁忧，时在光绪七年（1881）秋天。此时章寿麟准备由江宁起程回长沙，在江宁再晤李元度，故李元度“补书简首”，这便是李元度题词名为《题铜官援溺图》的原因。而光绪八年（1882）章寿麟从长沙返回江宁，重绘一图，则已更名为《铜官感旧图》，这便是薛时雨所见者。由此可推断：章寿麟光绪丙子（1876）所作图画题为《铜官援溺图》，光绪七年秋至光绪八年春所作则改题为《铜官感旧图》。

《铜官感旧图》面世之后，很快取代《铜官援溺图》，成为章寿麟征集题咏的媒介。近200家题咏者除李元度外，均未提及《铜官援

溺图》，可知此图可能不久即为章寿麟毁弃。在《铜官援溺图》之后，章寿麟为何要另绘一幅《铜官感旧图》？有一种可能是《铜官援溺图》一直寄存在李元度手中，而李元度迟迟不予题跋，以致于章寿麟无法取回原图再行请人题词。故而在丁忧回乡路过铜官时，感慨系之的章寿麟又绘制一图。这可以解释两幅图画的缘起，然而章寿麟此后又为何毁弃《铜官援溺图》呢？

况且，以常理揆度，章寿麟绘制《铜官援溺图》时，所题《铜官感旧图自记》最初全名应当是《铜官援溺图自记》，为何后来这篇《自记》此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铜官感旧图自记》。由此看来，1882年以后，章寿麟在《铜官援溺图》与《铜官感旧图》之间，选择毁弃《铜官援溺图》，而仅以《铜官感旧图》为媒介开展征集题咏活动，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考量。

二、“援溺”与“感旧”：曾国藩铜官落水事件的“众声”

章寿麟废弃《铜官援溺图》，而另绘《铜官感旧图》，与曾国藩铜官自溺、章寿麟援手一事的历史书写有关。曾国藩在铜官打败仗，企图跳水自杀，最终得救，这一系列事件中，章寿麟究竟贡献几何？湘军集团成员如何看待这件事？这些问题与章寿麟改图一事关系匪浅。

“援溺”一词，最早出自《孟子·离娄》，孟子回答淳于髡的问难：

（淳于髡）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11]

由此衍生的“援溺”一词带有两层意思：第一

层是字面意思——援救落水者；第二层引申意思则是拯救困难中人，且与“援天下”有关，因此又与拯救苍生密切相连。章寿麟初次绘图取名《铜官援溺图》使用“援溺”一词，一语双关，既表达自己拯救曾国藩于水中的历史事实，又隐晦表露自己援溺天下的功劳，用意甚深，但不免有标榜自己的嫌疑。

在《自记》中章寿麟这样写道：

湘乡曾文正公以乡兵平贼，抵触凶锋，危然后济。其所履大厄凡三：盖湖口也，祁门也，与初事之靖港也。而予于文正，惟靖港之役实从。……时公方被命治军于湘，乃命水陆诸将复湘潭，而自率留守军击靖港贼，战于铜官渚，师败，公投水。

先是，予与今方伯陈公、廉访李公策公败必死，因潜随公出，居公舟尾，而公不知。至是掖公登小舟，逸而免。公怒予曰：“子何来？”予曰：“师无，然湘潭捷矣，来所以报也。”……已而，湘潭果大捷，靖港贼亦遁去。公收余众，师复振。……又，予辈三五书生，亦知其不利而出，而无术以止公。盖非公之疏于计划，实忍之心，非久于军者不能，尤非仁义之徒之所素有也。犹忆败归时，公惟籍甲兵储待之属，以遣湘抚，尚一意以死谢国。^[12]

章寿麟《自记》开篇便说曾国藩一生有三大厄难——湖口、祁门与靖港，而靖港一事的核心即是铜官之败。文中接着说自己在战事开打之前与李元度、陈仁杰等人的谋划行为，曾国藩落水后自己的拯救行为。然而，关于这两段事件的记载，李元度、陈士杰两位当事人却与左宗棠有不同看法。下面将此事诸家记载制成《“铜官援溺”诸家看法异同表》做一比照：

《“铜官援溺”诸家看法异同表》^[13]

	章寿麟	李元度	陈士杰	左宗棠
为何潜伏在曾国藩船尾	“予与今方伯陈公、廉访李公，策公败必死，因潜随公出，居公舟尾，而公不知。”	“余与陈公及价人并请从行，亦不许。……四月朔，舟发。陈公固请从，峻拒之。余与陈公谋，令价人潜往，匿后舱备缓急，文正不知也。”	“力阻不可，请行，亦不可，乃以价人伺左右。”	“章君瞰公在舟时书遗属寄其家，已知公决以身殉也，匿舟后，跃出援公起。”
是否主动潜伏	章寿麟主动	李元度及陈士杰命令章寿麟	陈士杰命令章寿麟	章寿麟主动
战前是否请求追随曾国藩左右	无	有。章、李、陈都请行，临战前陈士杰又请行	有。陈士杰	有。（“公曾戒章君勿随行”）
援救过程	“公投水……至是，掖公登小舟，逸而免”	“文正愤极投水，将没顶矣，材官、僮仆力挽，文正大骂，须髯翕张，众不敢违，将释手矣，价人自后舱突出，力挽以上。”	“公猝赴水，赖价人掖之而免。”	“战事失利，公麾从者它往，投湘自溺……（章君）匿舟后，跃出援公起。”
其他援救者	无	有（“乃携登渔艇。南风作，逆流不得上，赖刘君国斌力挽以免。”）	有（“将弁群冒称援公功，而价人殊无言也。”）	无

章寿麟、李元度、陈士杰、左宗棠四人都亲历当日湘军与太平军对垒的长沙战事，但真正直接参与铜官一役的仅章寿麟一人。然而三人对章寿麟记载铜官援溺曾国藩一事，却有不同看法。对于章寿麟为何出现在曾国藩船尾，章寿麟记载声称战前他与李元度、陈士杰三人已经预料曾国藩一旦打败必然会死，因此他潜伏追随曾国藩左右，这似乎表明他潜伏在曾国藩船尾是个体行为。然而李元度的记载却有异辞：战前三人都请求追随曾国藩，不过曾国藩严词拒绝了，临行前陈士杰再度请行，又遭拒绝，因此李元度与陈士杰下令章寿麟潜伏曾国藩船尾。陈士杰的记载与李元度相似，表明章寿麟潜伏曾国藩船尾是受他指令。而左宗棠记载则声称章寿麟看到曾国藩写下遗嘱，知道曾国藩准备以身殉国，因此主动藏匿曾国藩船尾。左宗棠记载别有所本，恐怕是来自章寿麟的转述。

曾国藩自溺以后，章寿麟的援救行为，诸

家所说也有出入。章寿麟自记几乎全是自表功劳。陈士杰则笼统地指出功劳主要在章寿麟。左宗棠则言之凿凿云曾国藩身边当时并无其他人。然而李元度的记载则透露当时曾国藩身边还有不少部卒，且都曾施以援手，不过遭到曾国藩拒绝，最后才是章寿麟将曾国藩挽救上船。从后来诸将士争功来看，李元度的记载应当可信。而李元度还进一步说明，章寿麟援溺曾国藩后，曾国藩的性命之忧并未解除。因当时逆风而行，幸得湘军士兵刘国斌挽船而行，方才得免太平军之手。

由以上可知，章寿麟为显露自己功劳，在《自记》中有意遮蔽部分事实，从而夸大自己的功劳。而左宗棠受章寿麟提供的信息影响，进一步夸大章寿麟的功劳。但李元度和陈士杰这两位当事人对章寿麟的记载显然不能完全同意，因此还原了另一部分事实，在李元度的记载之下，章寿麟援溺曾国藩的功劳打了折扣。凡此，皆显示湘军集团对章寿麟援溺曾国藩一事有不

同看法，对章寿麟的一面之词，湘军集团内部存在不同声音。

铜官战役发生在咸丰四年（1854），二十多年以后，当事诸人的记忆已不可避免发生型变。“实际上，记忆从来都只有两种合法形态：历史的和文学的。但这两种形态并行不悖。”^[14]章寿麟多年以后忆及铜官援救曾国藩一事，已修改部分历史记忆。而李元度等人的记载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力图增添自己在那场战役中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章寿麟最早绘制的《铜官援溺图》，可能极力铺陈自己援溺曾国藩的场景，以尽可能凸显自己的功劳，故其画面的背景可能是铜官水战的混乱场面，图画中央则是曾国藩落水，而章寿麟施以援手。然而以这样的图画去征集题咏，突出章寿麟的援溺功劳，却不免丑化了曾国藩，因此这幅图画可能遭到湘军集团的抵制。虽然这种抵制不如王闳运撰《湘军志》一样触犯众怒，但从1876年到1881年的五年时间，章寿麟一则题咏也没有征集到的事实来看，其所受阻力也并不小。而李元度延宕五年之后，在章寿麟丁忧回乡路过江宁会面时，决定予以题词，个中原因很可能是此时章寿麟向李元度承诺将重绘此图。而改绘之后，章寿麟或许因心灰意冷，故一并将图画的题名也改为《铜官感旧图》。“援溺”改为“感旧”，拯救曾国藩的施恩邀功色彩淡化，而述往思来的历史沧桑感则因此增添。“感旧”的怀古色彩较“援溺”浓厚得多，给人想象及发挥的空间也更大，故而也较能为人所接受，并具备更强的传播属性。

三、伪章华跋与伪托张之万等人的图画

现存《铜官感旧图》原件共存图七幅，除第五册无图外，余下几册均有图，据图题所记，分别为：

第一册，张之万绘。题款：张之万。

第二册，姜筠绘。题款：《铜官感旧图》。宣统元年（1909）二月，曼仙仁兄以其尊甫价人公祖大人自记见示，属为补画……大雄山民姜筠并识。

第三册，林纾绘。题款：《铜官感旧图》。余既题《感旧图》还之，曼仙越十余日书至，言旧图为南皮张文达手笔，在南中亡失，嘱余补之。余即用文达法……此虽不见旧图，自知相去远矣。己酉（1909）三月三日闽县林纾。

第四册，汪洛年绘。题款：《铜官感旧图》。图旧系张文达为价人先生所制，后经遗失。甲寅（1914）之夏，其哲嗣曼仙仁兄属为补绘，谨志朝末。杭州汪洛年，时同客都门。



册一 题为张之万所绘“铜官感旧图”（左下方落款“张之万”）

第六册，宋伯鲁绘。题款：《铜官感旧图》。曼仙我兄大人法鉴：辛酉（1921）孟冬下浣，弟宋伯鲁写于京师城南寓斋，时年六十有八。

第七册，凌盛禧绘。题款：庚寅八月游衡山，泊舟靖江之铜官渡，即吾乡介人先生感旧处。断岸荒烟，黄芦红树，风景不殊，慨然久之。丁未（1907）秋，味青四兄以《铜官感旧序》见示，属为补斯图。图成并识之。昌江凌盛禧。

第八册，何维朴绘。《铜官感旧图》。覲瀛、曼仙昆仲姻世先生属写，并赘俚句请正。时癸丑（1913）十一月也。……七十二叟何维朴。

七幅图画除题为张之万所绘者无具体年月外，其余六幅都明确标识绘画年份。其中林纾和汪洛年都提到张之万所绘《铜官感旧图》曾经遗失的消息，但这一消息来自章华（字曼仙）。那么，原件中题为张之万的画作为何又出现了呢？凡此种种，疑问甚多。

先看宣统二年本第四册章同的跋语：

右图题咏，都为四册。先人手泽及同时侪辈之作，皆列首册。先人手泽及同时侪辈之作，皆列首册。



册三 题为林纾所绘《铜官感旧图》



册四 题为汪洛年所绘《铜官感旧图》

册。以下则贱兄弟之所征也，二册为文，三册为诗，四册为词，区其体裁，第其年月，以定先后。原图遗亡，姜、林两君为之补续，侷色揣称，肖其山川。文章润色，则道、咸、同、光四朝文献，颇存崖略。……宣统二年首夏，章同跋后。^[15]

章同的跋语提及“原图遗亡，姜、林两君为之补续，侷色揣称，肖其山川。”这里的原图为谁所绘，章同没有说，以常理揆度，当是章寿麟早年自绘，不太可能是张之万所绘。至于补图的姜、林二君是谁，章同并未确指。是否姜筠和林纾，也存疑。

然而原件中章同的跋语发生了很大改变。兹录如下：

右图题咏，都为四册。先人手泽及同时侪辈之作，皆列首册。下则贱兄弟之所征也，区其体裁，第其年月，以定后先。原图为南皮张文达公手绘，旋复遗失，嗣又得之。宣南何诗孙、林琴南、姜颖生先后均有所作，侷色揣称，肖其山川。文章润色，则道、咸、同、光四朝文献，颇存崖略。……宣统二年夏四月男同敬志于晋中忻州官署。^[16]

原件中章同的跋语笔迹不同，文字、落款及钤印（见图3、图4）悉数窜改。很显然，目前所见原件中章同跋

语系伪作。原件中明确指出林、姜为林纾（字琴南）和姜筠（字颖生），而且还声称何维朴（字诗孙）也补作一幅，然而均不可信。原件第八册何维朴作画时间在1913年，则伪章同跋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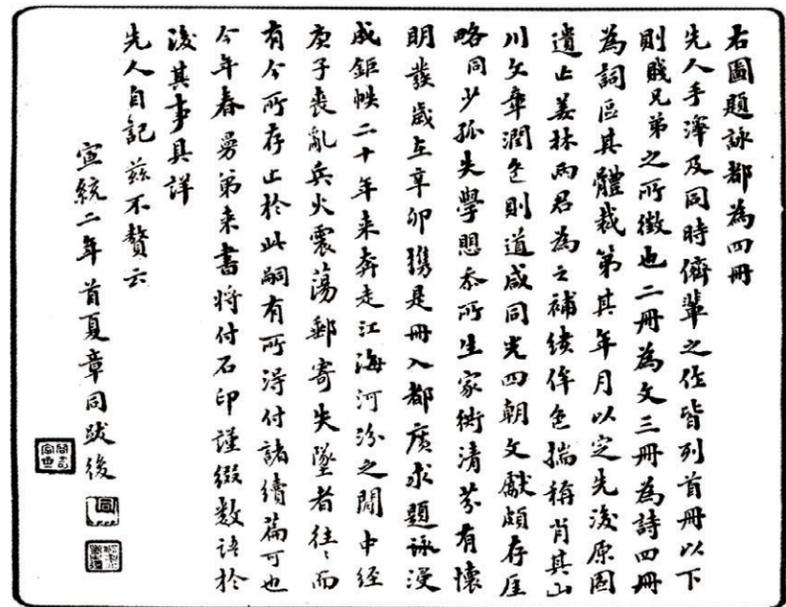


图3 宣统二年本章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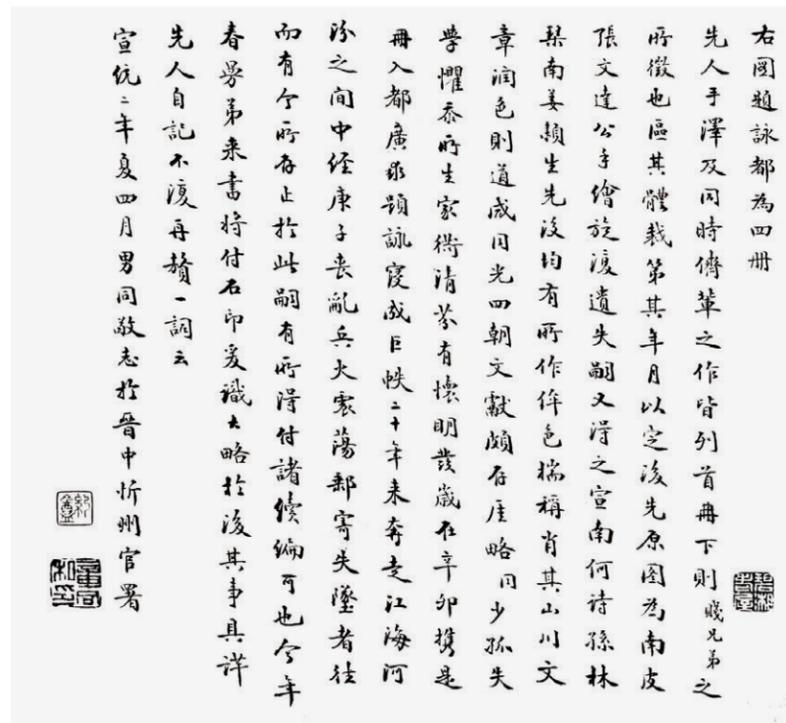


图4 原件章同跋

本年以后所作。

事实上，仅从题为林纾所绘《铜官感旧图》题款即知其系作伪。题款云：“余既题《感旧图》还之，曼仙越十余日书至，言旧图为南皮张文达手笔，在南中亡失，嘱余补之。……己酉（1909）三月三日闽县林纾。”考《铜官感旧集》及原件均收林纾题词《铜官感旧图记》，文中云：“长沙章君曼仙和悌彬雅，能文章，宦京师与余居相毗也。顾时过从，乃不审即为价人先生哲嗣，近出《铜官感旧图》属题。”^[17]这表明林纾曾见过《铜官感旧图》原图，以林纾的绘画造诣而论，见过原图的他不会不知道原件是张之万所绘（且现存原件该图下方径署“张之万”三字）。但题款却显示林纾获悉旧图为张之万所绘，乃是得章华信后才知道，显然于理不合。又据题款所言，则张之万所绘原图是宣统二年（1909）年闰二月中旬前后章华携带回南方时亡佚的，然而《铜官感旧集》第3册收录侯官沈瑜庆题词落款云：“曼仙仁兄属题尊甫《铜官感旧图》。宣统己酉三月侯官沈瑜庆。”^[18]则沈瑜庆在1909年三月还见过原图，又可证题为林纾所作题款为伪，该幅画显非林纾所作。又，林纾所作画落款一般为“畏庐林纾”“林纾”等，目前未见落款为“闽县林纾”的林纾真迹。

林纾的画作既是伪作，那么，原件第一册出现落款为“张之万”的图画是否为张之万真迹？笔者认为此图也非张之万所作。理由有二：

第一、《铜官感旧集》四册中题词均无一语提及《铜官感旧图》为张之万所绘，原件中另外增加的四册题词中同样无一语道及。张之万为晚清重臣，倘若该图为张氏所绘，190余位题词者不当无一人提示。

第二、张之万（1811—1897）同治间已任河南巡抚，后历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光绪八年，为兵部尚书，光绪十年入值军机处，兼吏部尚书。张之万位高权重，但与章寿麟似并无交往。在章寿麟绘制《铜官感旧图》的两个时间节点

光绪二年（1876）及光绪七年至光绪八年间，张之万在河南巡抚任上剿捻，光绪八年入京任兵部尚书^[19]，并未踏足长沙与江宁，因此章寿麟的《铜官援溺图》及《铜官感旧图》均不可能出自张之万之手。

题为“张之万”所绘图既是伪作，则第四册汪洛年所绘也大值怀疑。该画题款云：“图旧系张文达为价人先生所制，后经遗失。甲寅（1914）之夏，其哲嗣曼仙仁兄属为补绘。……杭州汪洛年，时同客都门。”该画又提及张之万曾为章寿麟绘《铜官感旧图》一事，其为伪作可知。又其落款“杭州汪洛年”与汪洛年诸多画作题款不合，考汪洛年绘画落款多为“钱塘汪洛年”“汪洛年”“鸥客汪洛年”等，钱塘属杭州，但汪洛年真迹中迄无此落款者，可知为造伪之作。

伪章同跋、伪林纾画、伪汪洛年画的目的很明确，即造成一种印象——《铜官感旧图》为张之万所绘。而其所利用的历史隙缝即是《铜官感旧图》原图曾丢失，后来请姜、林二人重绘此图。原件所存姜筠图画是否伪作目前不可知。因该画题款云：“曼仙仁兄以其尊甫价人公祖大人自记见示，属为补画。”较合情理。

那么，原件第一册题为张之万所绘图画出自谁手？原件另有王闾运1914年的题词值得注意：

周甲重逢又甲寅，当时堤柳尚如新。
早知援手终无益，始信灵均是了人。

曼仙前辈相访京邸，再示旧图，已是周甲故事矣。匆匆阅世，正值甲寅三月靖港战日也。劳苦功高，终归无补，又何如当时一瞑乎。然有生必有事，余但愧今之坐视，而不悔昔之从事。辄题二十八字以志愤懑。^[20]

王闾运这段题词透露：甲寅年（1914），章华又出示旧图给王闾运观摩，请求题词。而王闾运认定为“旧图”，可知章华出示者当是数十

年前（1887年前）他所见章寿麟所作《铜官感旧图》。也就是说章氏兄弟丢失的原图此时被找回来了。此时再看伪章同跋语：“原图为南皮张文达公手绘，旋复遗失，嗣又得之。”可知，原图虽然并非张之万所绘，但原图丢失是实，而原图在后来重新获得也是事实。由此可推测：伪造者对章氏兄弟及《铜官感旧图》的得失情况十分熟悉，此等造伪很可能出自章氏家族成员。

王闾运在1914年仍见到《铜官感旧图》原图，这张原图很可能一直保存下来，而冠于第一册之首。也就是说，题为张之万所绘的《铜官感旧图》实际上就是章寿麟在1881年秋天至1882年春天所绘者。

随着各类手卷的日益公开以及“文图学”的兴起，近年来手卷成为美术学、文学及历史学研究广受关注的材料。手卷往往是历时数年乃至数百年的累积性作品，外加手卷递藏过程中常常存在割裂情况，因此辨别手卷中文字与画像的真伪，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作为图像与题识载体的手卷，其物质形态是用心经营的结果。”^[21]手卷征集者及递藏者在“用心经营”手卷的过程中，有增减图像及文字的行为，更换手卷次序的举措，也有改窜乃至掺入伪作的举动。《铜官感旧图》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题名更换、伪作掺入、石印出版后继续层累积淀等过程，其复杂的物质形态变迁，可为研究其他清代手卷提供重要参考。要言之，厘清历史流变过程中手卷的不同物质形态，探讨手卷物质形态变迁背后的政治、社会及文人心态等因素，方有助于将手卷这类珍贵艺术文献纳入“信史”范畴，从而推动手卷研究走向深入。

（作者为南京大学博士生）

注释：

[1]（清）章寿麟等撰，袁慧光校点《铜官感旧图题咏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78页。

[2]长沙章氏辑《铜官感旧集》沈云龙主编《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3页。

[3]本文所称“原件”，俱指岳麓书社2010年据谭国斌兴兰堂艺术陈列馆所藏原件影印版《铜官感旧图题咏册》。

[4]本节统计数据分别据长沙章氏辑《铜官感旧集》、《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岳麓书社2010年影印版），统计作者数据不包括仅题签者。

[5]实则题咏册的征集题咏活动此后或仍在继续，柯绍忞题后仍有数则第八册题跋无年月可考。而章寿麟长子章同生卒年不详，次子章华（1872—1936），征集题咏活动或至章华卒年之1936年。见《铜官感旧图题咏册》，第715页。

[6]（清）章寿麟等撰，袁慧光校点《铜官感旧图题咏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13—515页。

[7]同上，第512页。

[8]同上，第650页。

[9]长沙章氏辑《铜官感旧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3页。

[10]（清）章寿麟等撰，袁慧光校点《铜官感旧图题咏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16页。

[1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4页。

[12]（清）章寿麟等撰，袁慧光校点《铜官感旧图题咏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0页。

[13]本表引文均来自《铜官感旧图题咏册》，为行为简练计，俱不注页码，尚祈见谅。

[14]（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15]长沙章氏辑《铜官感旧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333页。

[16]（清）章寿麟等撰，袁慧光校点《铜官感旧图题咏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08页。

[17]同上，第84页。

[18]同上，第147页。

[19]（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84—12386页。

[20]（清）章寿麟等撰，袁慧光校点《铜官感旧图题咏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53—354页。

[21]徐雁平《论清代写照性手卷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209页。

蒙叟墨的前尘梦影

□ 陆昱华

光绪十年（1884）夏，已是人生暮年的徐康在常熟友人赵宗建的旧山楼中养病。正是不病不得闲，虽然早有朋友让他笔记平生所见古今隃糜（墨），却因其常在娄县、新阳县做幕僚，“卒卒勘暇”，难践此诺。如今旧山楼中“几砚无俗尘扰”，于是每天记忆得数十则，并涉及文房纸砚、法书名画、书籍等，自谓“随忆随录，则同前尘梦影”，因以名书。

—

《前尘梦影录》以记墨事开始，卷上有一则记吴闻礼、吴闻诗为虞山宗伯钱牧斋制墨：

虞山钱牧斋有蒙叟墨，正面“牧翁老师珍赏”，背“为天下式”，旁注“门人吴闻礼制”。长方式，五钱重。又秋水阁墨，重约八九钱，牛舌形，面同上，背“秋水阁”三字，有阑。旁注“门人吴闻诗制”。满身线云环绕，阴文，字皆居中。后读《红豆集》，知吴氏昆仲皆歙产，集中有《秋水阁记》。^[1]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自称蒙叟，常熟人。这里提到为钱牧斋制“为天下式”与“秋水阁”墨的吴闻诗、吴闻礼，徐康据《红豆集》（或记忆有误），知为歙县人。其实，关于吴闻诗、吴闻礼，在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商

人吴其贞的《书画记》中多有提及，如卷一“杨无咎《雪竹梅花图》绢画一卷”条：

此卷丙子四月望日为子舍侄孙购之于仇斗垣。子舍讳闻诗，坦衷直谅，高节自持，与人交，始终不渝。幼能文，举笔千言立就。若辨古玩真贋，一见洞然。弟去非，聪悟亦然。时里中竞以好古相尚，而昆仲二人尤著云。^[2]

又卷二“梅道人《竹梢图》小纸画一幅”条：

此图得于邑中市上，寻归于去非侄孙。去非讳闻礼，美容仪，翩翩然有才子之风。读书之暇，好临池、赏玩古器，目力超迈，余亦服膺之。时己卯三月二十六日。^[3]

吴氏所记颇详，原来吴闻诗字子舍，吴闻礼字去非，是吴其贞的侄孙。兄弟二人都是读书人，却又雅好书画古玩，精鉴赏，“辨古玩真贋，一见洞然”。吴其贞是当时一个比较活跃的书画商人，即所谓的“飞帛人”，他的书画船往来于江浙之间几十年，与各地的藏家，无论文人名士还是裱工画商都很熟悉，因此几乎阅遍江南藏画，堪称具眼。他对自己的书画鉴赏也很自负，不轻许人，却称自己侄孙辈的子舍、去非兄弟“目力超迈，余亦服膺之”，可谓推许备至，也可见吴氏兄弟于书画确实浸淫很深。

吴氏兄弟称钱牧斋为老师，又自称门人，执弟子礼甚谨。吴其贞《书画记》中也记有他

们与牧斋的交往，如卷二“黄大痴《草堂图》小纸画一幅”条：

以上二图在子舍、去非馆中观于虞山宗伯手。先生自昔以文章名望著天下，性好博古。子舍特出余所集元人字百幅，计六十有二人，知其名者有半，余皆因元朝年号，知为元人之书，实不知其系也。讯之先生，一一悉其人始末，可见先生学博，称为才人，名不虚誉矣。是日仍见宗伯行囊中入记中者有：黄大痴《洞天春晓图》、郭河阳《高松山水图》、王右丞《雪霁图》、萨天锡《云山图》、王右军《平安帖》，不入记者：褚河南《西竹经》、米元章《多景楼诗》、米元章《题定武兰亭记》。以上皆得于溪南丛睦坊者，时壬午十一月六日。^[4]

这是崇祯十五年，虽然内外战事频仍，但江南尚称义安，牧斋多次前往徽州收集字画古玩，众人也得以追随左右，从容赏玩，过着一种风雅闲适的生活。而就在前一年，即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牧斋也有一次黄山之行，据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六《游黄山记序》：

辛巳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稍阑矣。徐维翰书来劝驾，读之两腋欲举，遂挟吴去尘以行。吴长孺为戒车马庀糗脯。子舍、去非群从相向怂恿，而皆不能从也。^[5]

牧斋此次黄山之行，即出于子舍、去非兄弟等人的怂恿。而就在这年夏天，柳如是（河东君）新归钱牧斋。第二年，牧斋又有徽州之行，并且行囊中所携书画甚夥，且多是煊赫名作，或许就是为了营造绛云楼，博河东君欢喜。据顾云美（苓）《河东君小传》：

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后，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龕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尊彝环壁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6]

但是吴其贞《书画记》所记，吴氏兄弟都是读书好古之士，雅好书画，却并未见关于他俩善制墨的记载，有人以为“吴氏昆仲系明末安徽歙县制墨家”，也没有明证。倒是牧斋文中提到的崇祯十四年与其同行的吴去尘却是当时制墨名家，钱氏《列朝诗集》丁壹伍〈吴布衣拭小传〉，称其善制墨，仿李廷珪（易水人），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后之关系”引此小传：

拭字去尘，居新安之上山。宗族多富人，去尘独好读书鼓琴，游名山水。仿易水法制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赠。富家翁厚价购之，辄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寅恪检徐康《前尘梦影录》上“虞山钱牧斋有蒙叟墨”条载牧斋门生歙人吴闻礼闻诗兄弟，为牧斋制“为天下式”及“秋水阁”墨事。可供参考。）坐此益大困。^[7]

寅恪先生在这里特别加了一段按语，提及“吴闻礼闻诗兄弟，为牧斋制‘为天下式’及‘秋水阁’墨事。可供参考”，似乎认为吴氏兄弟为牧斋所定制的蒙叟墨有可能就是由这个制墨名家吴去尘捉刀，实在是吴去尘制墨的名头太大，宋荦《筠廊偶笔》卷上所附张仁熙《墨品》：

吴去尘墨一截，不知何制。去尘在启、禎时始为博古新样，品目至六十余种，炫耀光景，较之君房土羹而象箸，大抵效法世庙时邵格之所为者。然形式既殊，物料绝胜，其床头捉刀，遂复寥寥不可多遘，久索乃得此以奉使君。去尘，先孝廉执友也。向所藏颇侈，今乃若海上三山，世变使然耶！^[8]

宋荦称吴去尘所制墨品有六十余种。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所引《明墨补录》记吴去尘墨品有“未曾有、无名朴、袭明、乌玉液、断璧、花铁、七宝光、不可磨、玄璧、恩成、嫌漆白、湛晴、玄草、紫金光聚、庵摩罗、写经墨、空青”等十七种^[9]，虽未及六十余种，但亦可见其品

目之一斑。

徐康亦曾藏有吴去尘墨，其《前尘梦影录》有记：

吴去麋（拭）墨得之海宁查氏，尚有原贮漆匣，长方罩盖，如东倭器式，木胎，中粘白绢，有吴氏选制小方朱文印。墨俱作博古样，仅四种，大小、厚薄、轻重不等。中惟一蝉形最小，不及二钱重，余皆完好无裂纹。惜不能全记其形状矣。辛酉冬游鹤沙，与邵格之墨同归郑斋主人。^[10]

徐康书作“去麋”，大约麋麋形近而误，赵宗建已于页眉批语中订正：“吴拭号去尘，无麋，恐误。”去尘乃吴拭字，非号，或取自“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吴拭也正是一个有洁癖的风雅之士，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卷十五“风雅”有吴拭小传：

吴拭，字去尘，别号遁道人，休宁商山人。性豪纵，有洁癖。尝持千金，一日都尽。终岁衣白布袍，不染纤垢。为诗清古澹隽，工书画，又精琴理，有《订正秋鸿》诸谱。尝自入山择木为琴材，故相传有去尘琴云。生平制墨及漆器精妙，人争宝之。其墨值视白金三倍。^[11]

吴去尘既精于制墨，而吴闻诗、吴闻礼兄弟又与之有交往，然则吴氏兄弟为牧斋所制墨是否就出于吴去尘之手？其实未必，因为吴氏兄弟的父亲吴长孺或许也擅于制墨，许承尧《歙事闲谭》“明墨补录”条引麻三衡《墨志》，记明代制墨诸家姓名，其中就有吴长孺。如果这个吴长孺就是吴闻礼、吴闻诗的父亲吴祚^[12]，则他们为钱牧斋制墨似乎不必假手吴去尘。

二

徐康《前尘梦影录》所记多雅人韵事，而一挺蒙叟墨又把我们带到了三百八十年前的那段风流岁月。但那也是最后的风雅了，没过多

久，曾经耽于制琴度曲，一掷千金的吴去尘就潦倒不堪，“为悍妇所逐，落魄游吴门。遇乱，死虞山舟中。毛子晋为收葬之。”^[13]所谓遇乱，当是清军南下，一路打过来。到了乙酉（1645）十月，徽州也沦陷了，吴去尘最后客死在虞山舟中。

就在这山河变色之际，那个曾经在读书之暇喜欢临池、赏玩古器的翩翩然有才子之风的吴闻礼又会是怎样的一番遭际？他先是在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中举，又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中进士，“以建祖母百岁节孝坊请归”。两年后，南北两京相继失守，吴闻礼与金声同时起兵。康熙《徽州府志》记下他最后的人生经历：

十月，徽郡破，闻礼敛兵去。再授兵科给事中，旋晋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上游，与詹兆恒同守仙霞关。丙戌，大兵入闽，闻礼为叛者所杀，师遂溃。其家刻木为头以敛焉。闽人祀名宦，钱塘祀于西湖六君子祠。^[14]

关于吴闻礼的死还有几种不同版本，如道光《休宁县志》，虽然多据康熙《徽州府志》，但是于吴闻礼之死却有说法：

丙戌，大兵入关（当作闽），闻礼仰药死。^[15]

而钱海岳所撰《南明史》所述甚详：

上嘉其忠，已命严防嵩溪。郑芝龙撤兵，闻礼不能独支，仙霞陷，入永丰山寺。或有劝降者，曰：“岂有堂堂抚臣而惧死耶！”遂率乡兵赴敌，力竭被执，不屈死，双目炯然犹视。^[16]

关于吴闻礼之死的不同版本，固然是出于人们对死事忠臣烈士的表彰。吴闻礼既于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一旦为臣，为大明作最后的牺牲似乎也就是他的不二选择。而他的哥哥，那个“坦衷直谅，高节自持，与人交，始终不渝。幼能文，举笔千言立就。若辨古玩真贋，一见洞然”

的吴闻诗，则最后选择了出家，“为僧，名一衲，字止庵”^[17]。

徐康《前尘梦影录》在记吴氏兄弟为牧斋所制墨中，其一为秋水阁墨，背有“秋水阁”三字。按秋水阁成于崇祯四年（1631），牧斋曾有记，今录其一节，以见人事之兴替，转眼遂为前尘梦影：

阁既成，主人与客，登而乐之，谋所以名其阁者。主人复于客曰：“客亦知河伯之自多于水乎？今吾与子亦犹是也。尝试与子直前楹而望，阳山箭缺，累如重甃。吴王拜郊之台，已为黍离荆棘矣。迺迤而西，江上诸山，参错如眉黛，吴海国、康蕲国之壁垒，亦已荡为江流矣。下上千百年，英雄战争割据，杳然不可以复迹，而况于斯阁欤？又况于吾与子以眇然之躯，寄于斯阁者欤？吾与子登斯阁也，欣然骋望，举酒相属，已不免哑然自笑，而何怪于人世之还而相笑欤？”^[18]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理论博士生）

注释：

[1] 徐康撰、孙迎春校点《前尘梦影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6-17页。

[2] 吴其贞撰、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3] 吴其贞撰、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8页。

[4] 吴其贞撰、邵彦校点《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5] 《钱牧斋全集》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47页。

[6] 顾苓《河东君小传》，范景中、周书田编《柳如是事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6页。又顾公燮《丹午笔记》“柳如是”条即本此传。

[7]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0年，第639-640页。

[8] 宋莘撰，蒋文仙校点《筠廊偶笔 二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9] 谢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第689页。

[10] 徐康撰、孙迎春校点《前尘梦影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11] 清丁廷樾、卢询修，赵吉士等纂《徽州府志》卷十五，黄山书社，2009年，第18页。

[12] 据吴其贞《书画记》卷一“罗稚川《村庄牛羊图》绢画一卷”条：“此图观于长孺侄家。侄讳祚，子含，去非父也。”第38页。

[13] 转引自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0年，第640页。

[14] 清丁廷樾、卢询修，赵吉士等纂康熙《徽州府志》卷十三“死事”，黄山书社，2009年，第12页。

[15] 道光《休宁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16] 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第2315页。

[17] 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06年，第5221页。

[18] 《钱牧斋全集》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39-1140页。

邹之麟斋号“破虏”

□文 亮

邹之麟，生卒年不详，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南京乡试第一（解元），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然仕途多舛，屡遭排挤，甫登第，即因科场事降上林苑，后升为工部主事。弘光时为尚宝丞，再迁都宪。明清易代后闲居不仕，隐于书画。

邹之麟别号甚多，姜绍书《无声诗史》称：“邹之麟，字臣虎，号衣白……画仿黄子久、王叔明，而潇洒苍健，自抒性灵，绝去画史畦径，惟觉奇逸之气，拂拂楮素间，图成而署其款，曰‘逸老’，曰‘昧庵’，盖寄兴于磅礴者也。”^[1]但邹之麟另有斋号“破虏”，见安徽省博物馆藏邹氏《仿古山水》，自题：“破虏斋仿古，逸道人戏作。”^[2]究其出处，当出于颜鲁公《赠裴将军诗》，中有“入阵破骄虏”句。《无声诗史》记邹之麟“酷好颜书，咀其精髓，尝得鲁公《赠裴将军诗》真迹，作斋藏之，而镂其诗于壁”^[3]，当即破虏斋。又据吴其贞《书画记》“宋高宗《临智永千字文》一卷”条所记：“以上二种并记中颜鲁公《祭姪文》在中玄兄丘园上观于仇斗垣手。同观者有武进邹臣虎先生。先生讳之麟，号依（当作衣）白，善临池、丹青，笃好古玩器皿。特来余乡，欲谋《祭姪文》，及见鲁公《送

裴将军出征诗》，后有太仓二王题跋，先生爱之，购此而却《祭姪文》。又《出征诗》是廓填者。时辛巳三月二十二日。”^[4]则邹之麟得颜鲁公《赠裴将军诗》在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当时明朝与清兵正频有战事，且屡屡败退，因此“破虏斋”当即构于此际。邹之麟为人“骨性劲挺，气度傲岸，有不可一世之意”^[5]，颜其斋曰“破虏”正可见其豪迈慷慨之性格。

“破虏斋”在邹之麟的画中偶一见之，画史也未见提及，盖未几而明亡，“破虏”遂成违碍也。

（作者为南京大学美术学硕士）

注释：

[1] 姜绍书撰、印晓峰点校《无声诗史 韵石斋笔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83页。

[2]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十二），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3] 姜绍书撰、印晓峰点校《无声诗史 韵石斋笔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4] 吴其贞撰、邵彦点校《书画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5] 姜绍书撰、印晓峰点校《无声诗史 韵石斋笔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2页。